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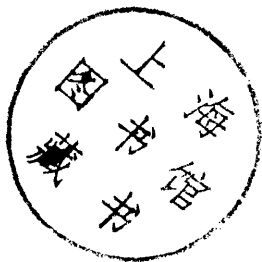
陳公博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9107B

#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 目錄

非有齋藏

第一 國民革命的危機……………一

(A) 共產黨的背叛國民革命……………三

(B) 對於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一九

(一) 對帝國主義的矛盾……………一九

(二) 對資產階級的矛盾……………三一

(C) 危機暴露後黨的動搖……………三九

第二 我們的錯誤……………五四

(甲) 黨的運用的錯誤……………五五

(乙) 羣衆運動的錯誤……………七五

(A) 農民運動的錯誤	八二
(B) 工人運動的錯誤	九二
(C) 商民運動的錯誤	一〇六
(D) 青年運動的錯誤	一一四
(E) 婦女運動的錯誤	一二〇
(丙) 政治訓練的錯誤	一二七
附錄一 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	一三六
二 我所謂革命的立場	一四六

#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 第一，國民革命的危機

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至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國民革命中興時期；自國民政府成立以至出師北伐，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國民革命全盛時期；自北伐以至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國民革命危險時期。這三個時期的變遷，當然各有其時代的背景，絕不能諉之於運命論。國民革命的中興和全盛兩個時期，我可讓之編國民黨史的來論斷，我這篇文章單單敘述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指出我們的錯誤，供我們同志和關心國民革命的來參攷。



開宗明義，我們首先要明白的，凡是一個革命，不論其為一個革命黨或是一個革命黨人，第一理論和行動絕對不能矛盾，其次則一切行動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而不應該站在黨的立場。違反了這個原則，在革命則絕對不能成功，在黨則根本不能成為革命黨，而且革命的力量必然分散，衝突，以至於分崩離析。我們平心靜氣觀察我們的過去工作，理論和行動矛盾的地方很多。自北伐到達長江以後，更處處暴露本黨的弱點。我預測我們的失敗，實非在於今日，而在兩漢克復武昌未下之時。去年三月間我在南昌發表『回到黨裏去』一文，更大膽的斷定我們必有今日的失敗。我并不願在事後發出不負責任的言論，但當時的事實已經明白告訴我們，而且我的感覺實在已經觸動我的心靈，到了這樣最後的判斷，這是我一個人的感覺，而且我相信有許多同志的感覺也和我如出一轍的。

## (A) 共產黨的背叛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的失敗，我們國民黨員當然不能諉過，而負最大責任的，尤其是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我在今日敢武斷一句，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其動機是參加國民革命，而結果加入國民黨的行動是背叛國民革命。照共產黨的理論，共產黨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純粹產業工人），然而攷察中國的實況，共產黨不獨不足代表中國的無產階級，其結果反足妨害中國無產階級的生存。第一中國所謂產業工人不過二百七十萬，共產黨藉數年國民黨政治掩護之力，人數突飛至四萬餘。此四萬餘人半數為小資產階級之學生，二百餘萬之工人固然已超出能够容許共產黨活動之範圍，而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其目的只在攘奪政權，根本不知工人的真正利益。第二在半殖民地而且在農業破產



的中國，產業工人的工資，等於中等階級職業的報酬，在工作上雖爲勞力之工人，而在生活上則與小資產階級相等。有此兩種原因，共產黨不能不舍其應有之部隊，出其全力以奪政權。所謂土地革命種種標語，純粹爲其口頭禪，而其真正之目的，仍欲在國民黨手裏奪取政治的權力。至於今日，暴動，搗亂，殺人放火，則竟離開革命立場，民衆利益，更無所謂目的。

我在十二年春間首次會晤蘇俄駐華代表越飛於日本的東京，越飛告訴我們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爲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的說中國只有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絕不能行共產主義。當時我很知道蘇俄只有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什麼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俄希望共產主義何時在俄實行，越飛只是搖頭不答。我問越飛六十年共產主義在俄能實現嗎？越飛回說不能。我更問一百年能實現

嗎？越飛說還是一個疑問。當時廖仲愷先生曾以很滑稽的態度對我說，『我們且做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罷』。所以當日我相信共產黨的確有盡力國民革命的動機，對於共產黨也抱有相當的希望。

我於十四年四月回國，參預撲滅楊劉之役，六月改組國民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同時復因五卅慘案，舉行省港罷工。但不久我便接有報告，共產黨不願國民黨領導此次大罷工，務於省港罷工委員會之上，冠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就因為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共產黨所操縱的緣故。及廖仲愷先生被刺以後，我繼任中央黨部農民部長，更接有報告，共產黨曾通令共產黨籍的農民運動特派員，所有重要報告只要報告於共產黨而不必報告於國民黨。當時我曾拿了共產黨的兩個通令和鮑羅庭辯論，我很沉痛的說『如果這兩個通令是偽造的，我便

沒有話說。如果是真的，那麼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應否有此？卽就我本人立論，如果不拿這兩個通令公開，我卽失了國民黨員的立場，如果公開，馬上足使兩黨分裂，而危及革命的進展。『鮑羅庭承認這是共產黨的幼稚行動，并承認以後當爲嚴格的糾正。此爲我發覺共產黨背叛國民革命的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對共產黨的失望。』

十五年出發北伐之前，事前我獲有共產黨的基礎計畫，第一共產黨擬以兩湖及河南作共產黨的根據地，第二在長江流域共產黨所注意的爲上海和漢口。我們出兵的地域是湖南，而第一期的軍事目的是武漢，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在在都足以和共產黨發生工作上的衝突。七月中旬我和鮑羅庭作第二次的辯論，而辯論的焦點第一是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第二是共產黨所主張的階級爭鬥。我對於第一問題的主張，是：

『無論那一個革命，若要成功，首要確定革命的領導權；而

革命領導權的誰屬，則不能不看人民的需要。中國目前如果需要共產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共產黨，國民黨無可與爭。中國如果需要國民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之國民黨，共產黨不能攘奪。否則革命惟有失敗，終至覆亡。照我的觀察，中國共產黨縱使不至攘奪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權，也有企圖共同領導的趨勢。自國民黨改組以至今日，國共兩黨惹起無數糾紛，分析原因，固由於爭羣衆，爭農工，而綜合起來，不過一言蔽之，爭革命的領導權罷了。我以爲對於此點，如果沒有相當解決，所謂聯席會議，所謂互派代表，都是空言，結果惟有失敗。我的第一主張，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應該專屬於國民黨。」

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主張是：

『階級爭鬥是一種事實。如果有階級爭鬥的事實，我們反對

也會爭鬥。如果沒有階級爭鬥的事實，我們就是拚命提倡，也鬥不起來。照馬克斯的觀察，階級爭鬥自有牠的歷程，其最要條件就是中等階級消滅，使社會上祇餘一個有產階級和一個無產階級，形成兩大壁壘，然後始謂之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爭鬥。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產業工人的無產階級僅有二百七十萬，我們目前絕不能單注意二百七十萬人的利益而犧牲三萬萬九千餘萬人的利益。此二百七十萬的無產階級，數量既非廣大，其質量到底幾何能夠做社會革命的部隊，很成一個疑問。至於中國的有產階級，我只能諡之為有錢的個人，決不能叫他們為有產階級，因為他們沒有經濟政治的組織，尤其沒有操縱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權能。實際支配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有產階級。所以就中國來說，有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而最

足影響中國社會的還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階級。中國現狀如此，如果提倡階級爭鬥，其結果形成多數階級的混鬥。此種階級混鬥的終極，第一使民族主義破壞，演成國民革命的危機。第二使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陣綫，減少社會的資本和生產力。第三使社會多數階級相互仇視，民權主義無法實施。第四生產低落，無產階級愈減功能，一方面不能建設國家資本，一方面更足妨害民生主義的萌芽。而且我對於馬克斯，嚴酷的批評，就是馬克斯僅根據當時大資本吸收小資本的理論，推論中等階級自然消滅。而不知歐美資本主義者近二十年的工作，就是專製造中等階級。我對於共產黨的批評，他們忘卻中等階級所以能為無產階級的部隊，因為他們被大資產階級壓迫消滅。反轉過來他們硬欲拿無產階級力量把中等階級消滅，結果反驅中等階級站在有產階級的壁壘。』

我們辯論了兩小時，鮑羅庭對於第一問題，口頭上承認國民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中國國民黨，然而并無具體的方法。對於第二問題，始終贊同階級爭鬥，而否認階級混鬥足以釀成國民革命的危機。至此我斷定共產黨拋卻其元祖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已經入了唯心派的無政府主義，這是我第二次對於共產黨的失望。

及至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我從南昌回到漢口，其時國共兩黨已經到了不能不分的時期。十三日共產黨發出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十五日國民黨通過制裁共產黨的決議。十三夜譚平山還找我作最後的談話。此一段談話可以當國共分裂的最終談話，也可以當我和平山個人一段決別的談話，我以爲很可以紀述供別個同志的參攷。

我說：『現在國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時期，我們是十年的老友，并且是三年來在國民革命共同工作的同志們。今日共產黨已發出退出國

民政府的宣言，則他日我們能否相見，很成一個疑問。今日我們談話，你應該離開共產黨的地位，我也離開國民黨的地位，以純粹革命黨的資格來談話。因我很相信我們為革命并且為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其次今日談話的焦點我專討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和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方法，其他枝節，我們當擱而不談。」

平山說：『這是我同意的，對於第一問題，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中國國民黨，但今日有一先決問題，則中國國民黨到底尙能否革命？中國國民黨能不能代表農工及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建設一個狄克推多的政府？』

我說：『如果談到這個問題，以我隸於國民黨的立場，當然否認你的疑問。而且能不能革命是人的問題而不是黨的問題。若就個人立論，我不能肯定國民黨人個個能夠革命，但同時你也不能肯定共產黨



人個個能夠革命罷！但現在我姑且承認國民黨不能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以建設強有力的政府，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呢？」

平山說：『那麼我們應該改組國民黨，或另組第三黨。』

我說：『改組國民黨或另組第三黨，我以為也有相當討論的價值，但到底中國共產黨還應否存在？』

平山說：『中國共產黨還應該存在。』

我說：『我們離開黨的立場討論，就工作方面觀察，我看不出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什麼分別。國民黨要國民革命，共產黨也要國民革命。國民黨的成分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共產黨的成分也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現在既認國民黨不能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才要改組或另組第三黨，那麼這個改組的國民黨或第三黨當然可以實際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我不懂的爲什麼共產黨還有存在的必要和理

由？」

平山說：『因為恐第三黨不能真正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不得不拿共產黨來推進這個第三黨。』

我說：『你這種理論，完全證明共產黨不肯放棄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我們既以國民黨不足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所以要改組或甚至另組第三黨。現在我們又不能信任第三黨，必須再以共產黨的組織來推進，那麼不難又以第三黨不足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而組織第四黨，或更組第五黨第六黨。這種奇異的推進絕沒有窮期，而國民革命的壽命已爲此一組再組所消滅。』

至此我已承認對於共產黨討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已無可再談，我們於是再進而談共產黨以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方法。

我說：『今日國共所爭的焦點，除了爭奪領導權之外，要算土地

問題。國民黨的主張是以政治的方法來解決，共產黨的方法是  
以農民暴動來沒收。今日土地問題已不成問題，只在解決此問題  
的方法。資本主義的英國已適用軒利佐治一部分的方法，希冀  
土地有相當的解決，至於蘇俄也由耕者有其田的臨時策略，企  
圖移轉土地的所有權於國家。但就我個人的經驗，中國目前土  
地問題，不在於耕作的土地，而在於耕作的資本。河套甘新，  
豐腴土地，寂無人耕，察哈爾每畝土地的價值不過七角，張家  
口附近則竟值兩角，黃河以北，我以為絕不成爲問題。至於黃  
河以南，我們也知人浮於地，但我居住江西三月——江西當然  
可以代表長江的農業區，據我調查，滿千畝者全省不滿十家，  
滿五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三家，滿一百至二百畝者平均每縣不  
滿五家。此所謂一家的人口平均皆有十人至二十人。如果說到  
純粹的沒收，則此種人家自己分配，每人也不過十餘畝。如果說  
到有土地的皆

有大罪，則暴動起來沒收土地，也不過移轉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對於國有土地，還是很遠很遠。我以為在長江以南解決土地問題，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將過剩的人口移送於北方，其次則速行建設國營企業，消納無土地的農民。否則甲攘乙奪，暴動將無窮期，而革命政權將亦隨暴動而失落。』

平山說：『有歷史到現在，沒有以政治方法解決土地問題的前例。只有以農民暴動起來沒收。』

我說：『如果能一次暴動來解決土地，我也相當的贊同，因為革命也是暴動，不過革命是有計畫的有條理的，暴動是無計畫的無條理的。然而照我的經驗，和我在長江流域的觀察，決不能以一次的暴動解決土地問題。并且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有耕作的知識問題，地方自治問題，決非單簡的分配土地可以解決。』

平山說：『如果一次暴動不能解決，則當爲第二次的暴動。』

我說：『如果第二第三次暴動都不能解決，那麼再用何種方法？』

平山說：『由第二次以至無數次的暴動，必以農民自己能夠解決爲止。』

我說：『你的理論是你自己的理論呢還是莫斯科的理論呢？』

平山說：『這是莫斯科的理論。』

我說：『如果這是你的理論，我也不再辯論。如果是莫斯科的理論，那我不能不加以糾正。我們要知道我們爲什麼要革命？就因爲要解除民衆的痛苦。但革命期間，當有革命的損失，例如生產的停頓和生活的變化，就是革命的損失。革命會不會失敗，完全靠着革命後的措施，如果革命後能維持秩序，填補損失，革命即可成功。如果革命以後，不能維持秩序，不能填補損失，反動即可突起。我個人不承認

反動是一個壞名詞，因為革命沒有方法和沒有力量才有反動，如果革命有方法有力量，反動必無從而起。像你所說一次暴動不能解決，可以第二次暴動。第二次暴動不能解決可以第三次以至無數次的暴動。那麼恐怕第三次暴動還沒有起來，四方八面已起反動。我的所謂反動，並不單指反動派這樣簡單，就是革命黨的本身見沒有方法可以維持革命的力量，也會反趨於反動的傾向。根本一句話，關於土地問題，國共兩黨的方法完全不能相同。共產黨爲什麼主張農民暴動沒收土地？就是不信任國民黨的方法，換一句話就是破壞國民革命的方式。』

上一段談話，是我和譚平山最終的談話。（現在聞譚平山已被共產黨開除，不知道他的主張還是不是一樣。）我對於共產黨已完全失望，進而至於絕望了。概括起來，共產黨的工作，第一其理論和行動

無往而不矛盾，第二其一切動作完全舍去革命的立場而單站在黨的立場。一方面失卻時代的革命性，一方面根本失其為革命黨。例如他們的理論，以為目前革命應以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同盟，參加國民革命應該和國民黨合作。然而他們的行動，因為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在長江流域專和小資產階級挑戰，甚至對小資產階級為極端的壓迫，惹起社會經濟空前的恐慌。一方面訓令黨員對外宣傳三民主義，以示和國民黨為密切的合作，一方面則指導黨員嚴酷的批評三民主義為不澈底的主義，使黨員意識進退失據，無所適從。最矛盾尤其是莫斯科的決議案，每一次均訓令黨員扶助國民黨的左派，鞏固國民黨的中堅，而同時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優秀分子，皆用壓迫引誘的方法，使之加入共產黨，搖動國民黨中堅的壁壘。這種理論和行動的矛盾，完全失卻革命黨的立場。迨南昌葉挺賀龍的叛變，共產黨殆已公然背叛國民革

命，走入不能生存的絕路。他們在廣東海陸豐組織蘇維埃，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的暴動，專以殺人放火爲他們力量的表示，是共產黨只知道有黨而更不知有革命，只知向國民黨報復，更不知有所謂唯物史觀。總括一句話，共產黨自南昌變亂以至今日，眼中已沒有革命，沒有民衆的利益，沒有所代表的農工。他們不只背叛了國民革命，而且背叛了他們元祖馬克斯的學說。歸結來說，他們自始至終，都違反了理論行動不能矛盾和不應站在黨的立場的原則，甚至由革命的動機入於反革命的行動。不過最痛惜的就是國民革命因此陷於中斷的危機，使國民黨也陷於理論和行動矛盾的敗局罷了。

## (B) 對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 (一) 對帝國主義的矛盾——



在目前我個人最感覺痛苦的，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但同時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妥協帝國主義不可。我這句話表面觀察，很似乎矛盾至於不可解釋。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的確如此，不容偏諱。我們在廣東奮鬥的時期，對於這一點並沒有深的感覺，自從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後，我們已避不了這種矛盾了。

對於打倒帝國主義的理論，我知道任何同志都已明白。但有一點我們最要明白的，打倒帝國主義，決非簡單爭政治上的自由，最要的目的還是爭經濟上的自由。租借地和租界的可惡，不在於領土權的喪失，而在於握了對外經濟咽喉的海口。關稅協定的可惡，不在於外人做了稅務司稅務員，而在於稅率之不自由。領事裁判權的可惡，不在於司法權之受削奪，而在於本國人民生命財產之不能受我國法律保障。我們更要明白的，一切政治都根據於經濟，如果沒有經濟的自

由，絕對談不上政治。今日所謂主義，所謂政策，實質說一句話，無非拿來解決經濟的問題。假定今日一切衣食住行都解決了，我敢決其更用不着研究主義和政策。所以爲求民衆的經濟解放，先要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爲要中國的自由平等，先要打倒帝國主義。

然而目前最感痛苦的，普遍的民衆已了解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但還沒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準備，我們黨和政府也始終沒有反抗帝國主義一貫政策的指導。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的失敗，在長江下游，單對帝國主義妥洽，而沒有整個的妥洽策略。在長江上游，單對帝國主義退卻，而結果紊亂退卻的步驟，以至民衆對於革命，完全失去信仰，最熱誠的革命者也意志動搖。我每從客觀分析國民革命中挫的原因，無反抗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是最大原因中的一個。

於此，在我繼續述明我們沒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以前，關

於外交策略我不能不補述的，就是在國共合作的當時，最足危及國民革命的就是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蘇俄自被中歐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封鎖以後，——自然英法等國爲發蹤指示的主人，已萃其全力向東方進行，當時的政策，叫做『到東方去』的政策。牠的計畫對日極端妥洽，深欲構成中俄德日的大同盟，想以德日的機器供給中俄，以中俄的原料供給德日。他們在俄日協定的當時，已送了一批利益給日本，如樺太島的煤油礦權等，一九二七年又準備送給日本第二批的利益，如西比利亞森林權等。在蘇俄的意見，何嘗不以爲『以物質的實利換取外交的成功。以今日的外交讓與博取明日的權利收復。』然而這種矛盾，第一危及中國的國民革命，第二犧牲了韓國的獨立自由。

我們要知道在素來獨立而且地大物博的蘇俄，讓與樺太的煤油權和西比利亞的森林權，本算不了甚麼一件大事。但中國已是半殖民地

的國家，國權自鴉片戰爭以至今日，喪失無餘，若仍與蘇俄的外交政策一致，是即等於辛亥革命要解除民衆痛苦，而首先承認不平等條約一樣。不但如此，日本在中國大陸政策，在歐戰以前，牠的防禦綫是山海關，歐戰以後，牠的防禦綫已南下至黃河的濟魯。中國不對牠讓步也要保持長江的新利益，和滿蒙山東的舊利益；中國對牠讓步，牠更可藉此機會以擴張牠的把持長江流域和流域以北的利益。不管蘇俄的外交政策怎樣，日本終不肯犧牲其帝國主義的國際地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縱使田中不出而組閣，日本對華政策還是『閣變策不變』的。

蘇俄外交的理論和行動既已到了矛盾不可解釋的地步，不但自己要對日讓步，更連帶而希望中國對日也讓步，并且要韓國犧牲其獨立運動對日讓步。一切所謂扶助中國的國民革命和聯合被壓迫民族的理

論都在『對日讓步』的政策之下，完全犧牲。去年我在漢口碰見一個韓國革命黨人，他很沉痛的對於第三國際批評，說牠已經到爲外交而外交的境地，所謂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政策，已變爲永不兌現的口號了。我們現在擱置韓國獨立的問題不談，單說中國國民革命的險境。因爲對日妥洽的緣故，對於漢口日租界慘案，固然無從得到勝利，日本反而乘着我們的弱點，態度強硬，對我們提出道歉賠償損失的要求，這麼一來，國民政府對於外交的地位，民衆的信仰，皆受一絕大的打擊。可是我們平心而論，爲什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會影響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爲什麼沒有獨立的外交？我們到底還應負很大的責任罷。

以上幾段因爲要述明我們反抗帝國主義沒有準備的工作，連帶而述及莫斯科的東方政策。但是我并不重視這種外交，因爲外交策略可

以隨時變遷，外間之壓迫雖時不同，但應付的方略依然在我。我所痛心還是國民只是了解反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始終沒有感覺應有反帝國主義的準備。我們到達武漢以後，帝國主義者對我們曾為消極反抗的總退卻，其結果直至我們無法可以救濟，以下一個簡表，可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在武漢的勢力：

(一) 輸入的原料

原料	百分率
(1) 煤炭	日本九十六 中國四
(2) 五金	日本五十 英德五十
(3) 布疋	日本七十 英國三十
(4) 絨類	日本四十 英國六十
(5) 煤油	美國六十 英國四十

(6) 機器 英美德日 (沒有一定準率)

(7) 電器 美德日英 (沒有一定準率)

(8) 堅硬木材 英美五十 日本五十

(9) 海味 日本九十八 中國二

(10) 其他 日本五十 美英德五十

(二) 長江的交通

國屬 百分率

(1) 英國 五十

(2) 日本 二十五

(3) 中國 二十五

自甯漢分立，中國船舶已不再行駛，握有長江航行權者僅有英國之太古和怡和公司及日本之日清公司。

(三) 工人的生活(專指隸屬外人的工廠和依靠交通為生活者。)

- |     |     |     |
|-----|-----|-----|
| (1) | 碼頭業 | 二萬人 |
| (2) | 紗廠業 | 六千人 |
| (3) | 煙廠業 | 三千人 |
| (4) | 蛋廠業 | 五百人 |
| (5) | 機器業 | 一千人 |
| (6) | 麵粉業 | 一千人 |
| (7) | 其他  | 二千人 |

自帝國主義者實行退卻以後，連帶商業和手工業者失業的，去年五月間我約略統計，大概要救濟的約數是十二萬人。自然十二萬人失業當中，原因於『對資產階級矛盾的』也佔大部分。

以上的略表，為我在迴憶中的統計，固然不能算為確據，但相差



也不遠。武漢每月銷煤量自六萬噸以至八萬噸，爲着帝國主義者的退卻，粵漢京漢兩路，大起恐慌。兵工廠水電廠和其他商辦的工廠時時都有停工的危險。五金缺乏，兵器製造額也不如前，在北伐進展期間而至兵器的製造停頓，有多麼的危險。美孚和亞細亞計畫停業，長江上游幾乎入了缺乏夜間燃料的狀態。這是關於原料缺乏的一種恐慌。

其次對於長江交通，因爲甯漢分立，招商和三北公司完全停了航。所餘僅太古怡和日清三公司的輸運。武漢的出口以棉花雜糧爲大宗。自英美下了在長江的僑民總退出以後，太古和怡和已預備停航，縱使不停航也停運商品，江漢關的稅務司有一天收過四百餘元的稅。長江上游的商業，可以說幾乎停止。這麼一來，已經沒有的社會經濟，完全破壞。政府的支出就是沒有超過收入一千二百萬，財政也無復可以維持。這是關於交通缺乏的一種恐慌。

其三，直接受帝國主義總退卻的失業工人不下三萬人。此三萬人急待救濟，以每人六元計，最低限度每月要十八萬元。如果平均每人假定每月收入十五元，實已每月喪失了四十五萬元。以喪失之數合之救濟之數，每月總和爲六十三萬元，至於其他間接失業之七萬工人，尚不在此數之內。這是關於工人失業的一種恐慌。

但是以上所述的損失，我僅指武漢而言，混言之就是指湖北而言。湖南江西和四川的損失，還沒有人統計。長江下游自安徽以下，比較安靜，我沒得着統計的材料，不再參入本論範圍。可是於此我要補充一句話，假使甯漢不至分立，其結果又如何？我自己可以答覆：如果帝國主義依然對我們消極的總退卻，其結果也會一樣。最多航運當中，招商和三北公司不會停航，而原料的缺乏，失業的恐慌，不會因甯漢不分立而有滿意的現象罷。所以去年四月至九月半年期間，工

人和外交部所打的筆墨官司，外交部和外國領事所打的筆墨官司，都是要求外人復業，歸根一句話，對帝國主義也爲總退卻的妥洽。

我們常常評論意大利的極端反動，就因爲意大利根本不成爲獨立的國家。意大利沒有鐵和煤，無法可以獨立。戰前的意大利煤的供給，英國佔百分之六十，德國佔百分之二十，法國佔百分之一十，其他佔百分之一十。中國不能謂之無煤鐵，而且富於煤鐵；但因爲沒有開採，語其結果，僅有獨立國家的資格，而無獨立國家的準備。在我們心目中的武漢有大冶的鐵，有萍鄉的煤，終使武漢不能自存，我們可諉於工運的錯誤，而使實業破產。但漢冶萍的破產不在於國民黨握有武漢後之工運錯誤，而在於國民革命軍未至長江流域之前十年。於是我們已可斷定國民只有了解反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始終沒有反帝國主義的充分準備工作，我們黨更缺乏一貫計畫的指導了。

今日帝國主義之在中國，其實力還不在於海陸軍，而實在於蒂固根深之經濟力。我們可以學甘地提倡不合作主義，不穿洋布而返於古代的手搖機，但我們終不能不用煤而停止鐵道的運輸，及工廠的活動。我們縱可以停止鐵道運輸工廠活動，我們終不能叫一般工人停止食飯，待不合作主義的完成。所以我很感覺，帝國主義不倒，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但要國民革命成功，先要對帝國主義者妥洽。但怎樣可以掃去這種理論和行動的矛盾呢？完全基於：

第一，國民除了了解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之外，要有反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低限度注意於交通的運輸和原料的製作兩者。

第二，中國國民黨應有反帝國主義一貫政策的建設——除了建設國家資本之外要扶助人民建設社會資本。

(二) 對資產階級的矛盾——

說到資產階級四個字，必定有人譏評我引用共產黨的理論。但首先我們要明白資產階級是事實，很清楚的擺在我們目前，其次資產階級是科學上的名詞，並不是單純共產黨的術語。但中國有沒有大資產階級？這很是一個問題。在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我曾證明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所以也不會有階級爭鬥發生。因為中國的城市資產階級大都吸食帝國主義的餒餘，不願意參加國民革命，以倒其靠山的帝國主義。鄉村的資產階級，因為他是封建的遺物，其性質與國民革命矛盾，參加國民革命只有戕害本身的生存。并且中國的資產階級既不能支配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且不能獨立的希望奪取國家的政權。如果還諛之為大資產階級，不是妄造事實，便是癡人說夢。

而且我們更平心觀察，在我們平日的想像，以為在城市壓迫人民的是買辦階級，在鄉村壓迫人民的是劣紳土豪。但事實上直接支配中

國城市的生產和消費，並且在必要時干涉中國政權，還是帝國主義的直接行動，買辦階級在帝國主義的心目間，還夠不上剝奪的工具，只是一個商業的傭奴。鄉村的劣紳土豪其所憑藉，還是封建殘餘的勢力——功名和大族。他們的作惡工具，不是憑藉新的經濟力——生產和消費，而是憑藉舊的宗法社會的遺傳。我這篇文章必定有人說我要替買辦階級和劣紳洗刷，可是我們爲得着今日社會的癥結不能不平情去觀察。

我們現在分析中國的經濟社會，是什麼一個社會？詳細解答，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的小作農業社會。城市找不出資產階級，只找出代帝國主義經營商業的經紀，鄉村找不出資產階級，只找出以力耕所得餘利來換洋貨的苦力者。誠然有些餘資的，可以喚他們作『有錢』的人們，然而可憐他們除可以溫飽之外，無處不直接或間接受帝

國主義的剝削。我發此種言論，並不是出發於唯心論，或者好爲形而上學的理論，但事實的確如此，不容偏諱的。

在這種搖搖欲仆的中等階級和農業社會，忽然把工業社會當中極強烈的工農運動搬到中國。他們沒有大資產階級作對象，當然以小資產階級爲對象。在城市當中沒有大工廠作工運的大本營，便以商店爲工運的中心。極南的廣州以至長江中心的武漢九江，表面雖然工人運動很強烈，但骨子裏實在還是店員運動。南昌對於大小商人的分界，有一次會規定五百元以上的資本爲大商人，不受商民協會的保護。這麼一來，商業唯有完全停頓，而入於社會搖動的狀態。鄉村間滿五十畝大地的農民，也被視作大地主，非被沒收，則行壓迫，結果農作也入了破產時期，而使鄉村社會生了顛頓的危機。我們對於工農運動當

中首要明白的，在工運一方面，凡屬店員皆隸於不熟練的工人，而且

他們的工作是『交換的』而非生產的。當工運最熱烈之時，我們只見生產低降看不見生產增長，就因為店員的運動為工人運動的骨子。而且城市的交換，多半是舶來的商品和輸出的原料，自帝國主義退卻以後，航運停頓，舶來的商品減少，原料的輸出停頓，一切商業已入於睡眠狀態，就使工人沒有加工減時的運動，商業已露危機；何況店員運動超出現社會要求，結果只有全社會崩潰罷了。

至於鄉村間還在於宗法社會時期，什麼是國家和法令總難深入於農村裏面。他們平日所畏懼的是縣官的個人權威，是土豪劣紳個人的威福，而非國家的法律和人民自治的條規。自有農民協會代興，他們全把這種組織，代替了立法和行政。再復加以極強烈的土地問題，農民沒收土地的煽動，於是全個社會感受不安，城市和鄉村整個入了搖動的狀態，於是一切絕無僅有的社會經濟崩潰無餘，而政府的措施幾



至無可措手。

我對於城市和鄉村社會的演繹，我很知道必有人批評說我的思想已流於反動，或者說我要開倒車。然而我們要閉戶著黃老的空談，不妨多唱高調，若要做真正的革命黨人，首先要承認事實。如果放棄現存的事實而高談革命，其結果還是反革命罷了。照着我們黨的理論，第一要行民生主義，首先走非資本主義的路，第二要完成國民革命，首要鞏固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陣綫。然而所謂不走資本主義的路，須要有統籌的計畫，即一建設國家資本，二獎勵社會資本，三限制私人資本。建設國家資本，在革命未統一以前，還非其時。對於社會資本，我還看不出有什麼組織。若私人資本，在此小農業的國家是微乎其微。然而在革命期間，所靠以維係社會生活，還是恃賴微乎其微的私人資本。現在突然破壞私人資本，而國家始終沒有時間和沒有準備

以補救此破壞後的幾微組織，不用說是危險萬狀了。

說到要完成國民革命，理論要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密切的聯合，誰也不能否認。但現在革命第一步發展，即對小資產階級進攻，——這完全是沒有大資產階級的結果，以至小資產階級完全脫離革命的陣綫，跑入反動的道路，至少也懷疑革命的終極，不會與他們有利。不但如此，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本與農工同樣不安，因為本身的環境，保持現狀和愛好和平的心理比任何階級皆為痛切。而且小資產階級的處境與大資產階級和農工都不相同。因為大資產階級能夠支配生產和消費，或者希望以奪取政權的手段來達他們的目的，有時極不願保持現象和愛好和平，——這是資本主義為世界大戰的原因。農工階級則久困壓迫的底下，無時不想生活變換和政治改革，希冀作進一步的生活改善——這是為什麼農工富有革命性。獨至小資產階級，即使

政治改革，因為沒有支配生產和消費的能力，很難得到滿意的生活。當其受政治和經濟壓迫的時候，希望革命之心極烈，而在革命之中或革命之後，對於革命的失望也最先。何況現在專對於小資產階級進攻，這種革命的危機是不容諱的當革命初進展時就暴露了。

在小農作而兼半殖民地的中國，誰為社會的中堅？要解答這個問題，先問一問誰為社會經濟的樞紐。或以為這個答案任何人都會直捷答覆是小資產階級。如果我們要革命，縱使說完全不要小資產階級，但我們終不能不要維持社會的經濟組織。自革命軍到了長江以後，表面上對於小資產階級進攻，而實質上就是先破壞社會的經濟組織。負這種責任的自然不是共產黨，但是我們國民黨也應該負沒有本黨中心策略的責任。所以過去的失敗並不單純失敗於軍事的投機，而實失敗於不穩定革命中的社會經濟。自到達長江以後，國民黨知道這種危險，

力圖挽救，但因為共產黨自有政策的關係，終於使革命分崩離析而底於中斷的危機。自民國十五年十月以至現在，各省的民衆運動，無論如何糾正，概括一句話，不過求小資產階級的諒解，要求小資產階級的合作而已。去年三月以後，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無日不忙於調和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問題，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所下的決議和訓令，大半都是計畫如何才可以安定社會的經濟，換一句話就是如何可以使小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可是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黨的行動早已流於偏枯，遂無從有糾正的機會。所以對於資產階級，也有理論須走非資本主義，而行動不能不對資產階級極端為無計畫讓步的矛盾。

### (C) 危機暴露後黨的動搖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以後，雖有許多對內對外政綱，但當時爲黨員所共信而以爲足以解決革命的有三點，即一，和共產黨合作，二，打倒帝國主義，三，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可是，現在已發覺共產黨背叛了國民革命，國民黨無再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因爲帝國主義者消極的爲經濟的總退卻，積極的爲對華聯合駐兵，感覺打倒帝國主義并非一種口號的單純工作。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固爲大多數黨員所願望，可是目見資產階級岌岌動搖的時候，連帶而牽及革命中社會經濟崩潰，也生了懷疑。有了這三種原因，早在漢甯還未分立以前，本黨已露了革命崩頹的險象。自湖南以至湖北，無論國民黨和共產黨已天天做那分裂的工作。在羣衆運動的當中，在講壇的上面，國民黨員祇管高呼國共合作，但無論誰人對於共產黨已作防禦攻擊的準備，共產黨祇管命令黨員宣傳三民主義，實際已極力煽動羣衆，做那打倒國民

黨的宣傳。在漢甯分立的當中，有一個共產黨員曾對我說，『現在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聲浪比反對帝國主義還高。』我不客氣的答『現在共產黨不是對民衆宣傳要他們不信任國民黨和不信任軍閥一樣？』自漢口發覺第三國際陰謀以後，國共正式分離，國民黨雖稱統一，但右傾分子以爲左傾的都有共產嫌疑，非根本排除不可。左傾分子以爲像右傾腐化下去，黨卽不能存在，也非根本排除不行。現在各同志當中，有許多詬病共產黨，說國民黨有左派和右派的名詞，完全是共產黨的挑撥。然而實際不客氣的來說，國民黨的分子複雜，何止是左傾和右傾，恐怕其中還有亂傾的。平心靜氣來說，國共正式分離之後，國共兩黨皆生動搖。國民黨員迷信社會革命的，縱使不正式脫離國民黨，思想和行動已脫離國民黨而傾共。因酷信國民革命而加入共產黨的，多因共產黨超出革命的需要，脫離共產黨而爲游離。自南昌葉賀

的叛變，廣州的暴動，共產黨益復破碎不完。可是因為共產黨背叛國民革命而至國民革命暴露極大的危機，因革命的危機，而至國民黨至今糾紛至今還沒有統一黨員的思想，和確固黨的組織，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

其次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因為黨和民衆沒有相當的準備，而且社會也沒有反對帝國主義充分步驟的累積，一面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一面極力購入帝國主義的製品。縱使帝國主義不為積極的駐兵，消極的退卻，也使民衆對於國民黨觀念模糊。我現在列一個外國對華貿易表，作讀者的參攷材料：

國別	年數	輸入貨值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香港	二三八、三五五	一七二、七八九	一一九、九七六
澳門	七、六八九	八、二七二	三、八七三
法屬印度支那	一〇、〇八三	一五、五七六	五一、五〇四
暹羅	二、三二六	一〇、五〇八	一六、五四五
星架坡	八、九一六	九、〇一六	九、八八九
荷屬印度	二〇、四九六	三六、八〇八	三一、三四〇
英屬印度	三八、七三九	四八、七三七	七九、〇七一
土耳其，波斯，埃及，亞丹	七七二	二、五六〇	一、二六二
英國	一二五、二九二	九二、四五八	一一五、五八三
德國	三八、五三九	三二、一四六	四五、三八二
荷蘭	二〇、四四〇	一〇、九四八	一〇、四九九



比利時	一八、二六七	一〇、七五七	一四、三四六
法國	一〇、四二四	一二、三一四	一六、七九一
意大利	六、二三六	六、〇三九	九、〇九二
俄國及西伯利亞	八、六一二	一一、八四四	二一、四四四
高麗	九、四四三	八、四六七	一〇、一六〇
日本(台灣在內)	二二九、七九一	二九六、二四六	三三一、五五一
菲律賓	三、一二四	五、二〇四	五、二九七
加拿大	一五、五五二	七、一七七	二四、〇三七
美國(檀香山在內)	一八六、三八七	一三八、六六三	一八五、〇六六
其他	一八、七二八	一一、三三六	二一、五一三
總計	一、〇一八、二二一	九四七、八六五	一、一二四、三三一

(附註) 上表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之表。一九二七年還沒  
有報告。銀數係海關兩，單位爲一千兩。

就上表觀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是國民革命最擴大的時期，也是民衆對於帝國主義反對態度最緊張的時期，然而輸入的貨值，還要比一九二四年增加。英國雖然減少了輸入額，結果只替日本和美國推銷製品和半製品。人民對於帝國主義既沒有打倒的辦法，尤其沿海城市商人，大半靠舶來物品的營運來維持生活，於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因之冷淡，國民黨的政府一方面要維持社會經濟，一方面要靠賦稅以供軍事和行政的需要，無形中不得不對帝國主義妥洽。在我們個人的批評，對帝國主義爲某限度內的妥洽是對的，祇有可惜當時黨部並沒有系統的設計。不獨民衆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念模糊，而且黨員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念也模糊。至於今日竟有重要的同志

們說要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這是何等奇怪的現象，然而因為對於帝國主義態度的矛盾，而至使黨根本動搖，是一個顯著的事實。

又其次說到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黨員當中的確受了共產黨的宣傳。他們的幼稚行動，不獨要打倒資產階級，而且更要打倒資本。他們并不知要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最要緊是建設國家資本，其次是增加社會資本。可憐中國尚沒有能支配生產和消費的資產階級，而且靠以支持社會經濟的還是這一班小資產階級，現在要一旦掃而空之，社會遂生出一種極大的恐慌。我們試看去年的長江流域，都市的商業停滯了，農村的生產減少了，工人和農民的失業漸漸加多了，物價天天騰貴了。在許多同志當中，至少發生不同的見解，有些以為如此革命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好些；有些懷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恐怕不通罷；不過當時壓於一種不自然空氣之下，口是而

腹實誅之，講不出罷了。這種現象我很相信每個同志心中，都有這種臆想，這又是因對資產階級態度矛盾一個很顯著的事實。

在革命途徑既有許多矛盾之點發生，而黨員之中對於革命的危機，又沒有補救的確當觀念，於是思想動搖，全黨也跟着動搖。各個人尋找自己的出路，遂使國民黨形成今日破碎的局面。今日的黨員當中意見，我很難綜合加上一個科學的名詞，祇有零碎的列在下面：

（甲）國民黨的組織太過嚴密，使每個黨員都不能自由，本來革命不革命全在個人，毋需乎黨的紀律。辛亥革命已經成功，當時也沒有這樣組織。所謂組織，所謂紀律都是共產黨拿來束縛國民黨罷了。現在清共，當然把這種組織紀律也要同時清去。這是一類。

（乙）黨的發展，完全靠着武力來推進。沒有武力就沒有黨。我現在已有充分的武力，黨非我掩護不可。中央黨部不過是個虛名，我

有了這個地方，我儘可隨我的意思來改組黨部和推行我的意見，這是一類。

(丙) 國民黨的糾紛，坐在領袖不能融洽。最使領袖分離的原因，還是在於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選舉。現在最好是泯除意見，把第一二次的中央委員融成一氣，共謀國是。只有事實，無所謂法統，這是一類。

(丁) 國民黨至於今日，完全像辛亥革命成功的初期，也是總理常常疚心，很沉痛說『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時期，所以國民黨最低限度也要爲第二次的根本改組，這是一類。

(戊) 國民黨沒有希望了，共產黨也不合現代的要求。如果要革命成功，唯一出路只有組織第三黨，這是一類。

各類的意見雖然不同，但不滿意於現存組織而別謀自己的出路則

一。一言以蔽之即是全黨的動搖，也是整個革命的動搖。第一派的同志們多屬於學校的教授和一般所謂學者，他們對於政黨的組織還受了幾微的影響，可是對於革命黨的組織還似沒有深切的認識。他們很富於自由思想，偏於個人主義。平常對於黨的束縛已經不自然，一旦遇了黨的動搖，當然盡量發揮幼而學之的黃老主義和少而習之的浪漫行爲了。第二派的同志們多屬於辛亥遺留下來的武裝同志們。他們孕育極悠久的武力主義和地方思想，中間更一度受了聯省自治說的影響。爲着黨的屢次失敗，也曾覺悟到非有健全的黨不可。自十三年改組以後，也曾束身受過黨的紀律。但是他們不斷的想現在的黨已經是健全了，爲什麼還失敗呢？我還是走回辛亥時的舊路罷。第三派的同志們多屬於舊日同盟會的同志，多樂於舊日半自由的組織。而且他們的思想以爲解決大計，只有極老資格的人才能參預。除了我們更沒有黨，

所謂黨就是我們。第四派的同志們多屬煩悶的青年，不想打破黨的組織，也不想破壞現存黨的法統。以爲今日黨的失敗就坐於黨之不健全，很想更嚴密黨的組織和紀律，完成將來的革命。第五派的同志們屬於游離於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青年，就其思想和行動觀察，已非在論列國民黨的範圍，只有存而不論了。

以上五派的意見，如此分歧，則黨已入於最危險的時期，已可想見。綜括一句話，黨員固不互信，也不信黨。今日倘使有人很鄭重的問我，國民黨還存在不存在呢？如果我是對他忠實的，我一定不肯回答。因爲我回答不存在，我確不忍；我回答存在，我又不能。

在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關於『黨的問題』一節裏，我最注意是黨的成分問題。我曾假定一個百分率表來檢閱黨的成分和工作。在國民革命當中，在黨沒有健全的組織，最危險的是『將

近的成功』。將近的成功，每每生下列的現象：

(一) 階級的分化。無論那一個國民革命，尤其是在中國一個半殖民的國家，斷沒有一個階級可以壟斷革命的勢力。在革命沒有成功以前，誰也能忍痛奮鬥以求成功的實現，及至將近成功，各階級遂乘時奮起，各求自己的利益。工人們要求加資，農民們要求減租，工商業者要求免稅，這都是必然的現象。孫先生的偉大就在『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平和方法處分經濟』，換一句話就是以完密的黨來抑平階級。國民革命是各國歷史普遍的事，三民主義是中國特殊的事，中國的國民革命異於各國的國民革命也在這一點。孫先生以民生主義為他的理想的鵠的，以建國方略和建國大綱作他的實行的方法。他能够預見階級的分化，所以懸一個『以黨治國』為整個革命的發動機。可是現在因為黨的動搖，而至黨員各求自己的出路，甚至有人懷疑一黨



治國爲不可能。今日便是黨內各階級分化的最劇烈時期，漢甯的分立，特別委員會的成功，我從不詬及個人，因爲我很知道完全是這個現象的表現，不過當事者自己不知不覺罷了。各階級爲什麼分化？坐於國民黨始終沒有感覺到一黨專政的必要，也沒有一黨專政的準備。從前雖然高呼以黨治國，可是給共產黨分了一半專政的權威，現在猶是高呼以黨治國，但是已經入了聯省自治的歧路。國民黨奄有長江流域，但我觀察江蘇的國民黨有他地方的特徵，湖北的國民黨也有他地方的特徵。我不敢說我們已經黨化了江蘇或湖北，只可以說江蘇或湖北化了國民黨。

(二) 要求的變遷。一個革命固然是時代的要求，一個革命黨也跟着是時代的要求，失敗的革命黨因爲自身淪於痛苦，時時顧及民衆的痛苦。及至黨的成功，個人的地位也同時增進。他們的地位和民衆

漸漸分離了，他們的要求和原始的要求不同了，他們的觀察因着環境變遷了。他們在握有支配權力的當時，未嘗不想并且很努力的爲民衆求利益，但因着事實上的困難和民衆時有求全之毀，把一切勇氣退減，久而久之或厭棄民衆了。

現在國民黨的領域已充滿地方主義的割據思想和個人主義的浪漫思想，從前以黨指導政府的最高理想已成過去的陳迹，無論那一個地方黨部，都依附於某一個軍事集團。在特別委員會的時代，因爲沒有中央，固不用說，在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開會以後，我想各省分立的情形，並沒有好過特別委員會的當時。『黨員固不互信，也不信黨』是今日革命危機暴露後最搖動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不是第三次代表大會所能解決呢？我以爲不必再待將來事實的證明罷！

黨的搖動不止是本黨的危機，也是國民革命的危機，互爲關係而

互爲因果。我曾說漢甯分立不過形成黨的分裂，特別委員會成立，更形成黨的破碎。其實不必待特別委員會成立，早因在革命期間的種種矛盾而使全黨動搖，黨務如果還沒有澈底的根本解決，必形成辛亥以後的國民黨——其實也可說早已形成，我懸念本黨的前途，很希望一切忠實的同志來負這個改造的責任。

## 第二，我們的錯誤

第一段我所論國民革命的危機，中間敘述的已有不少講到我們的錯誤，不過所謂錯誤，總包含有多少抽象性；本段我所說的錯誤，我應當更爲具體的說明，使我們同志更深切的了解。實際上說，無論一個黨或個人，縱使有健全的理論和意志，行動和牠的理論意志未必全然相同；縱使全然相同，但因爲環境的變動和時代的推移，行動也往

往失了牠的空間性和時間性。前一個場合，固然可以說是錯誤，後一個場合，也何嘗不是錯誤。然而我們要明白，黨的錯誤始終都不能免，只有視錯誤的質是本來的還是偶然的。如果是本來的，那麼錯誤還有錯誤的本體，如果是偶然的，那麼錯誤只有關係行動的本身。過去我們的錯誤，據我個人觀察，多數是偶然的而非本來的。現在更有許多人說『國民黨的理論太不健全』，但我說『從前我們的錯誤，與其說因為本黨理論不大健全，毋甯說因為本黨政策未能一貫』。不過有一句說話重為同志告，我們既承認了錯誤，只有拿『正當』來改『錯誤』，不能拿『錯誤』來改『錯誤』。

### (甲)黨的運用的錯誤

關於黨務問題，目前最少有兩個極端不同的意見。一個是：國民

黨的失敗，完全被共產黨的組織和訓練破壞了，所以我們要救黨，最好是以後不談組織和訓練。一個是：國民黨的失敗，因為組織和訓練太鬆懈了，所以我們要救黨，最好以後加緊組織和訓練。前一派可以喚做唯心派，後一派可以喚做實驗派。我雖然不反對良心救國論者的主張——因為見解不同，未必是壞；但我承認我到底是一個注重『物』的人，當然屬於後一派。我們黨的組織和訓練是不是已經健全呢？而且舉出幾個錯誤。

第一，統。一。政。策。的。缺。乏。本來黨的組織，用不着有什麼批評。今日雖然有人批評本黨組織錯誤，不應採用蘇俄的委員制。可是本黨的委員制自有其當時的特殊情形，也有其過去的歷史。現在渙散的徵象，并非錯誤於委員制與非委員制，而實錯誤於始終沒有一貫的政策。我常常聽見有許多同志說，各級黨部之有農工商各部，完全是共

產黨的分化各階級作用。誠然也許共產黨有分化各階級的企圖，但要知農工商是一個現存事實，如果有整個的政策，設置農工商各部只有分工，沒有分化；如果沒有整個的政策，不設農工商各部，只見有分化之弊，並沒有分工之利。往常中央和各省黨部，我看不見有什麼整個的政策，各部各自爲政，任意孤行。在各部聯席會議當中，甲部的計畫和進行，乙部很少知道；乙部的計畫和進行，甲部也不問不聞。大家沒有討論過計畫的衝突不衝突，只知道各自爭經費的多寡。在廣東的時候，浮現於我們目前的是工商的衝突，及到達湘贛以後，那知道農工也常衝突了。（關於這一點，我想另著專論來批評。）至於農工商的衝突，黨部最大的作用就是『調停』。事前很少有攷察糾紛的原因，事後沒有想到消除糾紛的方法，文言之是『應付』，淺言之是『敷衍』，這是沒有統一政策錯誤的第一例。

其次，依據本黨的政策，黨部和政府是一貫的，並不是對立的。除了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因為有一個政治會議還可以勉強粘合以外，地方的黨部和政府，已經蛻變為議會政府的對立形式。普通民衆的思想以為黨部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是代表官僚的，黨部常常站在民衆方面，向政府唱過高的調子，作過度的要求，始終忘記本身站在指導政府的地位，不管政府能夠給予不能夠給予。政府也忘記本身產出於黨部，或予而不出於誠意，或竟靳而不予，儼然當黨部是與議會同一可厭的東西。我屢次看見許多黨部和政府聯席會議，通過許多決議，發表許多宣言，說到實行的結果，總落到一個虛無歸宿的懸案。最奇怪的常常同一個人，坐在黨部的席上發了許多高談，坐到政府的席上便束縛了手足。我往往自想是不是理論和方法矛盾呢？其實是沒有一貫政策的錯誤。

第二，運。用。敏。活。的。缺。乏。敏活本爲農業社會所最缺乏的性素，國民黨的本質當然帶有極濃厚的農業社會彩色，所以無往而不暴露缺乏敏活的弱點。依我的經驗，無論在中央黨部的祕書處或在中央黨部的各部，要得下層黨部的報告，真是千難萬難。有時偶然得了某省的報告，照例寫着新增黨員若干人，辦了文書若干件；若在舊時工農運動時期，更標題本月罷工若干次。至於該省的經濟背景怎樣，黨員的成分怎樣，罷工的原因怎樣，可說是半字未嘗提及，總括一句話，就是下級黨部完全對上級黨部缺乏材料的供給。至於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也漠不相關，無論什麼重大問題，每個黨員只能於公開報紙得着上級黨部的模糊意思，萬不能每個黨員都得着黨部的直接命令。縱使有重大的議決，亦僅得寥寥議決的幾個字：這個問題怎樣發生，這個議決怎樣重大，黨員應注意的是某點，都很少有詳細的指示，總括一



句話就是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完全缺乏正當的指導。所以黨部對於黨員只有請求工作的應付，沒有討論方法的時間，什麼是本黨的中心理論，自然更談不到。黨員對於黨部也自然只有揣測，冥想，摸索，久而久之或趨入於歧途了。

還有國民黨一部分黨員是海外的華僑，歐洲和日本的總支部大部分還是留學的學生，可是這種黨部就與中央黨部不大聯絡。國內的政治狀況和運用的策略，中央黨部很少報告海外總支部，而海外狀況，海外總支部也絕不報告中央黨部。譬如去年英國聯合各國向華出兵，無論任何海外支部，事前絕沒有報告，及至事實已成，動員令已下，中央遂陷於縛手縛腳的狀態。不但如此，國民黨員所辦的報紙，可算遍佈世界，東至澳洲，西至南北美，橫斷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線，若以指數計算，總佔華僑報紙百分之九十，然而此種報紙與國民黨部毫不

相關，宣傳部固不能直接指揮，而此等報紙也不接受黨部的命令。并且此等報紙的影響只及於一部分的華僑，不能及於所在地的人民和政府。這種宣傳和行動不敏活的情形，真是夢想不到。我居留美國和經過南洋的時候，我也曾問他們何以如此？他們總是說：這是國民黨人所辦的報紙，並不是國民黨所辦的報紙。原來國民黨和國民黨人是兩樣的，這真使我疑不能釋了。

第三，組織嚴密的缺乏。說到嚴密兩個字，我可以大膽的說，國民黨始終沒有組織。按照國民黨的組織，平常在代表大會閉會時，最高機關當然是中央黨部，以下是省黨部，縣市黨部，區黨部，區分部。但我們要知如果黨的組織是嚴密的，牠的基礎當然是在下層，然而事實正與我們的理想不同，現在各級黨部都成了高級黨部的襯託物，很像有了中央黨部，不能不組織省黨部來襯託；有了省黨部

不能不組織縣市黨部來襯託；有了縣市黨部不能不組織區黨部和區分部來襯託。不止如此，據我個人的經驗，在革命根據地的特別廣州市，區分部就不常開會，開會也從沒有過總出席。而且省黨部或政治上稍占重要地位的黨員，一百人當中沒有一個在區分部有過登記，一百次開會當中沒有一次出席過區分部的會議。就這種情形來說，不要說革命黨，就是尋常政黨的組織，恐怕也沒有這麼鬆懈罷！於此而還說國民黨可以不要組織，那麼我們應該開一個北京甘石橋議員俱樂部，或安福衙門的俱樂部了。

此外還有一層錯誤，就是黨部公開固是黨員的普遍要求，而黨部有時祕密，也是革命環境所不可缺。一間學校或工廠，我不懂得爲什麼黨部一定要公開？普遍的學校和工廠，不一定學生和工人都是黨員，而且一定是較少數的學生和工人是黨員。在這種情況底下，許多

未加入國民黨的學生和工人對於國民黨還是反對，懷疑，最低限度不信仰。這時候如果黨部公開，第一非黨員的學生和工人容易起受壓迫的反感，第二已加入黨的學生和工人很容易暴露驕傲和滿足的心情，第三無論任何運動都被非黨員視為含有其他作用，不易得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在特殊情形之下，黨員別有特殊的情緒，在學校和工廠的黨部公開，至少與青年和工人特別喜歡祕密的心理相違。我們黨的組織太應用原則而不顧及特殊的情況，也是錯誤的一個例。

第四，成分標準的缺乏。無論任何一黨都有標準的成分。譬如有人主張國民黨所代表的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那麼黨內的農工和小資產階級所佔的成分，當然有一個比例的標準。在反對一方面說，國民黨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是共產黨的理論，我們應該改說，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中國的困苦民衆；照這樣說，黨內的成分，也應該有個困

苦民衆的標準。但返觀我們黨內，始終沒有談到成分，也沒有談到成分的標準。這麼一來，不特黨的基礎容易動搖，而且令黨部檢查黨務也沒有基本的計畫。自前年五月至今重新登記的命令不知下了多少次，但重新登記的意義無論如何嚴重，語其結果僅僅填了一張空洞的入黨表，實際上我們絕不能得有重新登記的效果，這是什麼原故？很容易明白的只是沒有黨員成分的標準。

關於吸收黨員的觀察，國民黨改組以後和改組以前都有同一的錯誤，就是大家迷信『量』而不相信『質』。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以前，第二次出兵東江和統一南路時，在作戰區場，不論誰人都可進黨，當時的計畫完全在擴大宣傳，希望以『量』來弄好『質』。這種計畫我不能批評說是完全錯誤，但計畫的第二步，是要在宣傳擴大以後，應該即行整理。但可惜統一廣東以後即行北伐，『量』是盡量擴充，而

『質』始終沒有整理，使到革命策源的廣東各縣黨部，大半爲豪猾把持，壞的黨部竟成包攬詞訟的機關，好的黨部也不過成爲縣議會的形勢，說到以黨治國的設計，已離題萬丈了。廣東地方黨部如此，長江流域的地方黨部，因爲軍事的迅速發展而無暇整理，此較廣果情形怎樣，不問可知。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本來有一個入黨年齡和資格——自然不是什麼資格，只要能了解三民主義——限制的提議，後來因爲大家迷信『量』的緣故，終於否決了。大家既然迷信量，遂連帶而有對黨觀念薄弱的趨勢，有一次廣州市教育局會下命令，一切教職員皆須入黨，在入黨表內『爲什麼要加入國民黨』一格內，發現過『爲奉局長命』的笑話。粵漢鐵路局也曾下過一次命令，一切工人皆須入黨，同樣在『爲什麼要加入國民黨』一格內，發現過『爲吃飯』的笑話。不過這兩位同志還是忠誠的自白，其餘真的『爲奉局長命』

和『爲吃飯』，假的偽造出『爲要國民革命』或『爲篤信三民主義』而入黨的同志們還不知多少。一個革命黨的組織成分，複雜到這樣，對於革命前途，真可悲觀了。

不惟如此，我們平常對於黨員和技術人材的分界，從沒有注意。一個能做黨員的人，未必可以作官；一個能作官的人，未必有做黨員的資格。大凡做革命黨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刻苦奮鬥，而專門藝術的人材，大都富於自由思想和浪漫精神。我們爲要整理和建設，應該盡量的選用專門人材，可是我們同志大都誤解以黨治國的意義，不懂得以黨治國是以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治國，並不是拿國民黨員盡做了官才是以黨治國，所以弄到凡官必黨，入黨皆官。我不敢拿壞的心思度人，說多數官吏都是官僚，腐化，投機；但因爲凡官必黨，使到黨內充滿自由思想和浪漫精神，黨紀遂日益墮落，以至無從整理，是一件

事實。辛亥革命的失敗，失敗於此，今日革命有中斷的危機，也危在於此。

第五，紀。律。嚴。緊。的。缺。乏。說到紀律兩個字，或許有人譏誚我叫我『黨紀先生』，或者罵我思想是『黨皇帝』，然而至今我們黨裏可憐還沒有紀律。據我的經驗，在中央黨部所見，一年內開除黨籍的不滿十個人，以號稱四十萬黨員的黨，一年開除的不滿十個人，照例應該有嚴密的組織，和有嚴密的紀律了。但按之實際，并非因有組織和紀律而違反黨紀的少，實因違反黨紀的太多而懶得執行。監察委員的同志們多非因黨務問題而對某人彈劾，實因意見問題而對某人彈劾。黨的問題少，人的問題多，信仰一墮，紀律空成了一個名詞，人人都

有蔑視紀律的慣習，這是一件顯著的事實。

其次最重要的黨員，最不注意嚴守紀律的素養。例如總章所規定



的黨員納費，黨員開會，不管如何，這也是一個紀律。但據我所知，有幾個重要黨員月月去黨部購買印花，次次出席小組會議？更有些重要黨員至今并黨證而無之。在上者可以諉之大計紛煩，無暇顧及，在下者便可以說小事鞅掌，偶爾忘之。紀律既像非爲我輩而設，則雖天高談紀律，效果亦等於零。所以我們一方面固很痛心於不談紀律的人們，而一方面感覺如此紀律，索性推而翻之，亦大家痛快之一道，但黨就此收場麼？這不能不感慨系之。

今日紀律已變了具文，我們更感覺黨對於具文的紀律，只是『文』而不『具』。在每次官吏就職都有很嚴重的宣誓典禮，宣誓決不僱用無用人員，不營私舞弊，不授受賄賂，如違背誓言，願受本黨最嚴厲之處罰。這種誓言，并不是官紀，實是黨紀，而每年因營私舞弊及授受賄賂得免職處分的人不知多少，而實際上黨就沒有處罰過，嚴厲不

嚴厲，更談不到。黨員犯罪只有政府的處分，沒有黨的處分；甲地犯事的黨員，跑到乙地可以任事，有時不止任事，還可升官。如果說官紀和黨紀不同，那麼何必多此形式的黨的宣誓？這不外表示沒有注意到黨紀罷了。

第六，黨員訓練的缺乏。我常常遇見本黨同志相與聚談，都有本黨人材缺乏的感嘆。每遇一件大或小的工作，無不躊躇及人選困難的問題。說技術罷，黨內不少國外及國內大學專門的畢業學生，說下層幹部罷，中央和各省黨部已辦了不少的幹部學校。爲什麼本黨還缺乏人材？無非是本黨缺乏黨員的訓練。我在第二段內已指出本黨運用敏活的缺乏，下級黨部對上級黨部缺乏材料的供給，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缺乏正當的指導。簡括言之，就因沒有『訓練』。有許多技術人材，因沒有黨的訓練，缺乏了刻苦奮鬥的黨員素養；也有許多下層

幹部人材，因沒有黨的培育，缺乏了科學的特殊知識。本來所謂人材各有其特殊的應用，拿鐵來說罷，好的可以練鋼，做機器；最壞的也可以做平常器具，甚至做鐵釘；如果能够訓練得宜，至少可以得相當的效用，何至人人無事，事事無人呢！

本來一個有組織的黨，找尋人材大可於黨內求之。區分部的人材當然浮現於區黨部；區黨部的人材當然浮現於縣市黨部；縣市黨部的人材當然浮現於省黨部。然而現在的所謂『材』，并非表現於黨，而實推薦於『人』。缺乏了『材』，不能在黨的組織之內去搜求，而靠某人某人的推薦。我信任某人，便連帶信任某人所薦的人。結果在黨員方面，拋卻黨在背後，釀成奔競依附之風；在黨方面，只見有人，不見有黨，形成某人某派的分封勢力。無論任何方面，對於黨只有危險，沒有利益。我在漢口時候，有一次很沉痛的說，國民黨已失了革

命黨的本質，變爲封建的集團，但沉痛祇管沉痛，破碎之局已成，人爭割據，惟恐私人的勢力不張，還有何說！

第七，工作檢閱的缺乏。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未曾有過檢閱黨員的工作。一個最淺顯的列，本黨號稱四十萬黨員，這四十萬黨員中，有幾個有黨的工作，有幾個沒有黨的工作，可謂完全絕不知道。已經有工作的黨員成績怎樣，現在還沒有工作的黨員能力怎樣，也絕不知道。不但如此，現在『工作』兩個字，已成了前清『差使』的代名詞，黨員當中好像插身入軍隊和政務當中，才算工作，否則只爲掛名黨員，像前清的候補官吏無異。我在鄂贛服務黨部和政府差不多一年，每日請求工作的人，不知凡幾。客氣黠的同志則『請求』工作，不客氣的同志則『硬要』工作。他們所謂工作，在軍隊則要求上校以上，在民政則要求縣長以上，在財政則要求獨任一個稅局爲單

位。如果沒有相當的給與，便說某人不要民衆了，某人已離開革命的青年了，革命工作已淪落到這個境地，真可慨嘆。

上舉一個例，不過在普通黨員錯認革命的工作，實在就坐於黨部沒有檢閱黨員工作之弊。常時黨部派出一個特派員，以後這個黨員的工作怎樣，黨部絕不過問，這位黨員究竟到了什麼地方，黨部無從知道。地方民衆對於一縣的黨部不滿，省黨部很少攷查不滿的原因和檢閱其過去的成績，如果這個縣黨部的執行委員被人打倒，省黨部便另派幾個委員，如果這個縣黨部的執行委員能夠站得住，省黨部也樂得聽其存在。尤可怪詭的，爲着經費問題，爲着用人問題，縣黨部和縣長衝突，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現象；遇了這種場合，省黨部一封公函送到省政府，便算完事，黨部和縣長究竟誰的不是，省黨部懶得去管。省政府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把這封公函一批批去民政廳，民政廳一

擱便擱到毫無結果。黨部不對的，從沒有見上級黨部有什麼處分，黨部對的，也時時看不見縣長有什麼懲戒。這種無紀律不敏活的情形，如果在前清時期，可以加一個攷語『疲玩不振』，我們黨內犯了這樣老衰病，可憐也不自今始了。

第一次代表大會所定的和第二次大會所修改的總章，至今雖巍然存在，可是區分部開會與不開會，區黨部永不過問；區黨部開會與不開會，縣市黨部永不過問；縣市黨部開會與不開會，省黨部也永不過問。至於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的報告，從未有關心的檢閱，據我在中央和在省黨部的觀察，一切報告都列在議事日程最先，如果報告是簡短，有時主席還念一念；如果報告是覺得太長的，那便照例不念，擱置起來。報告的內容怎樣，大家不知道，報告的工作有沒有錯誤，大家不批評，甚至上級黨部對於直屬下級黨部的負責人員姓名都很模

糊，論到他們個性的識別，工作的好壞，自然更說不到。

今日本黨的散漫，可說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所沒有的現象。各級黨部停頓，這是中央一時的政策，我暫不加以批評。不過可憐一切黨員都似打了敗仗的散兵，到處請求收容，四處飄離，生活精神，兩俱墮落。國民黨現在不是執政的黨嗎？何以弄到現象如此？我們的忠實同志應該想出一個黨的出路罷！我重復一想，大凡一個黨到了搖動時期，這種現象，當然不免，可是這種現象萬不能使其延長，如果他日至於黨覆滅了，我們都要負責任呵！

軍隊不檢閱，軍紀就會廢弛，黨員不檢閱，黨紀就會崩壞。我常見許多同志，當革命緊迫，機危四伏的時候，逍遙事外，橋膝清談，及至時代承平，奄有寰宇的時候，握袂而來，嬌其往史。黨為點綴昇平，固然願意養老尊賢，可是這麼一來，連帶而親戚故舊，充塞朝

市。檢閱工作一句話，固不必談，革命空氣也因而稀薄。時至今日，我也不願說許多呻吟的說話；我只希望忠實的同志，時時要顧慮革命的前途，并且時時要返顧無數羣衆和革命青年站在我們背後。革命不是一個人的事業，如果不根本改革，全黨也要崩壞的。

### (乙)羣衆運動的錯誤

今日有許多人說『羣衆運動是共產黨的理論』。并且更妙的說『羣衆運動的目的是要來對抗政府，今日還要講羣衆運動，豈不是要打倒自己嗎？』。我可以深刻點批評，我們始終沒有做過真的民衆運動工作。從前共產黨是運動羣衆而不是羣衆運動，我們國民黨是看運動羣衆也沒有做過羣衆運動。過去羣衆運動工作的錯誤，最低限度有三點：



（一）沒有深刻了解羣衆的要求。我所謂羣衆，當然指整個的而不是分化的。我們提倡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當然是羣衆普遍的要求，在普遍要求裏面，羣衆還有一種極切要的要求是『社會經濟的建設和秩序安甯的保障』。人們爲什麼要革命？因爲經濟受壓迫身體不自由，再淺一點說就是經濟要找較有希望的生活和身體要找較有切實的保障。當革命空氣最熱烈的時候，無人不抱有這種希望心。含有革命性的人們當然打仗衝鋒，就是不含革命性的人們也隨羣衆的熱情，不知不覺心理變爲革命化。可是我們到達長江以後，因爲軍事的需求，社會經濟無從建設；因爲政策不統一，使農工小資產階級各有敵對的行爲。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爲着沒有準備，漸漸妥協了。打倒軍閥的工作，爲着黨的糾紛停頓了。因爲革命期中存有無數矛盾的事實，影響及於黨的動搖；黨的動搖，又影響及於民衆的離散。

一個社會能夠生存，完全靠着經濟的組織。現在已經不及而且不能建設，最少限度也應該維持原有的現狀。我們只顧及軍事的進展，沒有顧及這種深切的要求。近來更因共產黨背叛革命，大家只顧及嚴厲的清共，又運帶而不能顧及人們身體的正常保障。步驟一亂，人各走其極端，所以我們一方面只見着共產黨的亂殺行爲，一方面又只見本黨的忙亂步驟，民衆的深切要求怎樣，已沒有人注意到了。

其次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國，整個民衆有整個民衆的要求，各階級民衆有各階級民衆的要求，惟是在承認事實的革命黨，應該對於破壞的經濟，有一個整個的恢復和建設的計畫。對於各民衆的要求，應該體察社會經濟能不能給與。我們的過去，只領導民衆爲過度的要求，沒有指示民衆以現在的事實和經濟的限度。我們要知道過度的要求絕不是羣衆真的心理所願望，工人過度要求，結果危及工人的生

活，農民過度要求，結果也危及農民的生活。但我們始終沒有昭示民衆這種現存事實，連一個經濟的統計表，物價的指數表，也沒製作，這豈能自命深刻了解民衆的要求，且自謂可以解決民衆的要求嗎？結果只有使各階級的羣衆叢怨於本黨罷了。

(二)沒有充分準備運動的計畫。關於這一點，我已在『黨的運用的錯誤』明白指出統一政策的缺乏，這個錯誤完全由於不能深刻了解民衆的要求而起。我以為前此的民衆運動，不是出以『空想』就是出於『盲動』。當初大家以為『羣衆起來了』，便什麼都可以不顧，這是空想。大家又以為盡量『領導農工鬥爭以爭利益』，馬上可以成功，這是盲動。多數的同志們只有領導羣衆開會，遊行，呼口號，發宣言，總沒有人計算社會的經濟，中國的事實，和定一個預備的計畫，對於羣衆要求預想一個相當給予。我們理論要實行民生主義，但

總不騰出一點時間去想想建設國家資本的方法，譬如廣東每月收入七百萬，在未北伐之時，軍費月不過花四百五十萬，北伐以後，廣東軍隊出發三分之二，軍費反增加至六百二十餘萬，爲什麼每月不縮減些軍費來建設？我誠不願加以刻酷的批評，但不肯息心靜氣去想國家資本的建設，是無可諱言的。廣東是北伐的後方尚且如此，那麼在軍事行動的區域如何，可以想見。又我們對於國民革命的理論是要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同盟，可是我們的行動完全壓迫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戰綫。農民之輕易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工人任意佔據及封鎖工廠商店，這都是理論和行動矛盾最顯著的地方。我們今日雖痛心疾首於共產黨當日背叛國民革命的陰謀和超過時代需要的盲動，但當日我們自己實在事前毫無一定政策來實現理論，對於社會經濟未嘗爲深切的調查，事後且無補救政策來補償社會的損失，是不容自諱的。現在黨部

的活動及民衆運動，都因爲從前過失而停止了，『過猶不及』的責任，我們同志也應該擔負呵！

(三) 沒有真確了解運動的意義。所謂民衆運動，應該領導民衆參加革命，指正民衆的切實要求，并要時時預防民衆的錯誤行動。我們最大的錯誤，深刻地說，與共產黨如出一轍，運動民衆而不是民衆運動，淺一點說與收買民衆沒有分別。農會的組織要黨部津貼，工會的組織要黨部津貼，其餘商民學生婦女的組織無一不要津貼。而許多同志的心目中，也認此爲羣衆運動的不二法門，各地的羣衆多少，差不多視津貼的多少爲標準。我們承認工作人員的生活是應該維持的，宣傳和組織的經費是需要的，不過這種津貼只應該是暫時若干期間和臨時的支出，斷不能視爲經常津貼。有了這種惡例，一切民衆團體都倚靠着黨部和政府而忽視本身的獨立生存，民衆運動的人們只當

自己是黨部和政府工作的一員，而不肯深入民衆中間去宣傳和組織。每月開羣衆大會最多而到會人數最多的便算最努力而最負責，對於民衆的要求是怎樣，他們茫然不知，縱使深知，因為要維持努力和盡責的名譽，也只好『知之爲不知』了。所以民衆運動的結果，農民有時被迫棄去春耕夏耘秋收的時間去開會了，工人有時被迫停工餓着肚子去開會了（以車夫工人受此壓迫爲尤甚），商人有時被迫閉了店門停了生意去開會了。開會愈多，羣衆的刺戟力愈鈍，半成熟的革命性一次兩次被這種妨礙生活的運動擊碎無餘。『革命的利益是怎樣的呢？』：他們最初很熱烈的想。『革命的利益不過如此罷！』：他們繼而很冷淡的想。『革命的利益倒妨礙我們生活了！』：他們最終很不平的想。最後不平之念一生，羣衆運動的意義便完全消失。實在不待今日四崩五裂的事實發生，反動的觀念已普遍於社會。現在黨務糾

紛，支離破碎，好謾罵的自然說某人某人右傾和反動，其實這班先生們不過代表這一時一類的現象罷了。

以上三種錯誤是爲今日反動的概括主因，我且再分析幾項錯誤，供我們同志的參攷。

### (A) 農民運動的錯誤

農民運動的錯誤，在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已指出不少。在批評國共分裂的人們都以爲『農民運動政策之不同』爲國共分裂的原因。在反對第三次中央執監會議的人們大都詬病『土地政策的決議』爲共產黨操縱會議的根據。據我所知共產黨的目的完全在暴動，關於土地問題尙談不到政策不政策。我們在去年三月間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共產黨的中央在五月才開始討論土地問題。所以共產黨去

年五月以前的行動完全是盲動而非政策。今日事已過去，我們姑略而不談，我且批評過去農民運動的錯誤。

(一) 妄用鬥爭的方法。過去的農民運動爲共產黨所操縱，這是不可諱言。但我們沒有自己政策並沒有感覺黨的專政之必要，是我們的錯誤。共產黨何以專注力於農民？因爲感覺中國無產階級的工人不足爲他們的部隊。共產黨忘記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忘記他們元祖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並且忘記列甯自己批評俄國革命錯誤『只有下層的暴動而無上層的指導』。他們認不清事實，認不清中國是小小的農業國家，認不清中國的農村是宗法社會。在經濟最簡單而關係最複雜的農村，妄用鬥爭，結果只形成個人的混鬥，而顯不出階級的爭鬥。我常說今日而在中國的農村提倡鬥爭，無異乎提倡鬥爭於一個家庭。據鬥爭的原理，應該愈鬥爭愈顯經濟的分化，但在今日農村鬥



爭，愈鬥爭愈形關係的混亂。農民運動的原始目的便這樣單純，縱使像共產黨今日真個勝利，完全沒收了土地，還是離中國真正農民問題很遠很遠。

(二) 要求利益的偏枯。就『農民運動』四個字觀察，很像對於農民有普遍利益的要求，其實過去的工作，只是偏於『佃農的運動』。最初國共合作，對於農民運動的理想，最低使中農中立，而設法盡量鼓動小農參加革命。然而過去對於農民運動的決議，最明顯的是前年年底聯席會議的減租百分之二十五案，去年三月全體會議的減租限於該年實行案，都是對於中農，小農，自耕農，僱農，沒有直接的利益；其餘所謂農村銀行和農村合作的計畫，不過紙上的空談。利益既如此偏枯，而農民協會的力量又只在無業農民而不在佃農手上，所以農民運動僅成了無業農民的單純組合，佃農縱使減了租，其所得

利益還不夠農民協會主要人物的供養，實質來說，農民運動除了產生鄉村一個新貴階級之外，久無意義了。

(三) 濫用權力的錯誤。農民運動當中最有成績的要算打倒劣紳土豪。我並不是謳歌過去無業農民的暴行，在數千年中國的不變農村，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一方面是紳士獨裁行爲，有這麼一種激越的行動，的確可以改變鄉村人民的封建思想而漸引入於民治思想。不過最可惜的，舊的劣紳土豪勢力既倒，新的劣紳土豪勢力代之而興。我常批評中國的農村，組織是宗法的，經濟是家族的，思想是拜物的。什麼是法治？他們自幼至壯，至老且死，未嘗夢到。無論司法立法行政宗教之權都操於族長或劣紳土豪之手。好了，農民有了組織，舊的勢力倒了。但同時農民協會也有他們同樣司法立法行政的權力。他們同樣可以自由沒收，同樣可以處罰殺人，政府的法令依然不能過

問，一方面依然是無政府主義，一方面依然是新的紳士獨裁行爲，把農民運動更一變而爲部落運動。我聽見湖南有一個誠實的農民跑到農民協會去問『老爺！我今年的錢糧交到縣裏呢還是交到協會呢？』。執行委員很莊嚴的回答『唔！交到這裏罷』。這種農民運動，真是欲哭無淚。

(四) 疏忽生產的獎勵。農民在中國佔重要的位置，并不單是在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實是在生產佔極緊要的位置。我把近年中國出口的種類和價值列一個表在下面。

品類	量的單位	價值……海關兩
綿貨	………	一二・〇六二・八九四
綿紗	一九二・二三〇担	一〇・八一一・九五四
錦砂	二九九・〇三三担	五・七三二・六五四

生鐵	二・八三五・一七九担	四・四一五・一七三
礦鐵	八・六八七・七九三担	一・三四八・七八四
錫塊	一〇九・三四三担	八・七三八・三九三
錫礦	一一七・四〇八担	一・六六九・五二三
牛羊	一一・九六七頭	四一〇・一三六
豬	一一〇・二〇四頭	一・二五七・一八六
鷄鴨	一・〇七五・一七九頭	三八二・二一〇
豆餅	二六・〇五四・九二六担	七〇・〇〇九・三八二
豆 (大宗黃豆)	二二・五六三・五六八担	七五・〇六八・一五六
麩皮	三・一八二・二九七担	六・九五九・九五
鬃毛	六六・八八五担	一〇・四六八・九七一
地氈	.....	六・五四七・二一八

穀類 (粟及高) 八・一二四・〇三三担 二八・七四一・六九四  
梁大宗

紙煙 八五・四二五担 一五・四一五・八〇一

煤 三・〇八四・七二二噸 二六・一八八・七〇一

綿花 八七八・五一二担 二九・三九九・三八一

蛋白蛋黃 九九三・五三一担 二九・六九三・四八一

蛋 七五八・七六〇・〇〇〇個 八・四八〇・三四九

纖維物 (棕, 蔴紗) 五〇〇・五二六担 七・四〇五・一一七

花生 三・〇〇〇・〇四五担 一八・五三四・一六二

腸類 ..... 四・六七五・九三五

花邊 ..... 四・五八五・二九八

豬膏 八七・七九六担 一・六八九・六八六

蓆 ..... 三，四八三，九三九

猪鷄鴨肉 ..... 四・六四二・一八七

藥材 ..... 五・二七一・一〇八

菜油 (豆油木油花) 四・四〇二・三〇三担 五八・二六七・七二五

紙 ..... 五・一一五・七六一

植物仁 四・七八八・〇六五担 二二・八九四・四三七

植物仁餅 (豆餅以外) 二・一三三・六四八担 四・二〇九・六九七

生絲 一六八・五六三担 一四四・八二六・三五八

碎絲 一四三・八〇〇担 九・一五二・四九八

絲貨 一八・七六三担 二一・三六四・一四六

絲綢 一九・九四八担 九・四九三・五三六

牛皮（未製）	二四三・四四八担	八・〇二一・八九八
羊皮（未製）	一〇九・〇八二担	六・一七四・二三五
其他皮類	一三・六九五・三〇七件	一三・四〇八・四〇八
草辦	四八・七四〇担	三・〇五〇・四二一
脂肪	九七・五二九担	一・三〇三・八一〇
茶	八三九・三一七担	二六・一六五・二六七
木材	.....	九・五七九・一六六
生熟烟葉	二六五・七五六担	六・四六四・四五四
羊毛駱駝毛	二四七・七九九担	九・七三二・九〇二

從上表觀察，狹點說農產品佔出產百分之七十九，廣點說可以佔到百分之九十八，因為除了六種礦產以外，無一不與農產品有關。縱使說農民運動應用極端的鬥爭，但要維持農民的力量，不能不同時注

意到農民生產力的增進。可是以往的工作，天天總是高呼運動，農民的生產知識，一些沒有人提及，農民的生產工具，一些沒有改良。各省的農林試驗場，荒廢的荒廢，取消的取消。各省的水利，泛濫的泛濫，壅塞的壅塞。各地的現象依然像辛亥的情形，大家專注意於政治而忽略政治所從出的經濟。不過當日以為國會和憲法是萬能的，今日以為開會游行是萬能的罷了。形式的政治刺戟性過強，實質經濟的生產性便因之減退。這一點是農民運動最主要的錯誤。

（五）缺乏自治的運動。今日中國的農村依然還在於宗法的時代，推翻封建思想是必要的。惟是革命只是一時的手段，要維持革命的力量不能不靠一種合進化原則的方法。我們既要打倒鄉村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獨裁，則應完成自治的機關，使多數農民能夠了解民主制度的意義，不使封建思想有復活的机会。我們從前對於這種工作，太



沒有準備，至使協會的獨裁代了鄉紳的獨裁，在農運時代的農民未見得比較在劣紳底下減少了壓迫。在去年三月全體會議雖通過一個湖南省民大會試行法規，可是這個提案是由共產黨員提出，意在使共產黨多得政權，這個提案當時即不爲人重視。湖南省黨部和省政府也曾草定一個鄉村自治條例，但內容的意義又適全爲共產黨張目，自始至終還未有實行。至於今日『自治』兩個字幾成了廢詞，但如果地方自治不能完成，我敢說我們只有搖旗吶喊的農民羣衆，沒有真實革命的農民羣衆，一切農民運動不過是一種好聽的名詞，離三民主義很遠很遠。

## (B) 工人運動的錯誤

工人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固無法解決，在號稱共產黨執政的

蘇俄也至今沒有解決。產業愈發達的國家，工人問題也愈複雜，就是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工人問題也是複雜，不過複雜的原因，各有不同。在產業發達的國家，工人集中的都市，大而國家的交通，小而至家庭的生活，無不變為工業化。譬如國家要建設一條鐵道，當建築之時，最有效率的是分段開工。例如一段作工要二千工人的，分五段便要一萬工人了。鐵道的完成，分段固然快些，但鐵道完成以後，這一萬建築工人便有失業問題發生了。而且世界市場的要求，常常有漲落，——就是資本主義消滅以後也是如此，——冬天衣服的需要比夏季多些，冬天燃料的需要比夏季厲害些，每到時令的轉移，和人們慾望的變換，必有一部分工人變了時代的犧牲品。這是產業發達國家工人問題複雜原因的單純解釋。至於產業落後的國家，經濟往往為產業發達國家所左右。因為舶來的製品廉價，本國工廠就會停工，縱不停

工，工人的工資自然降下。因為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本國工業不能發展，工人的質和量只有下落而無增加。這種連鎖關係，我們姑且不談，先述述中國工人的狀況。中國手工業者，粗疏點計算，有二千萬人。產業工人粗疏點計算，有二百七十萬人，然就產業工人中，若單計算熟練工而不含有手工業色彩的，恐怕還不到百萬。過去工人運動當中，最感困苦的，工人本身有下列兩個難點：

(一) 地方主義。工人是一個階級，這不只是社會主義者的熟語，也是研究勞動問題者所承認。但是在產業落後的中國工人，無處不充分含有地方主義。廣州的工人有各府的分界，上海的工人有各幫的分界，漢口的工人也有各縣的分界，甚至廬山抬轎子的也分九江幫和黃州幫。不要說工人形成一個階級非常困難，就在一職業以內他們要統一團體也非易事。一個職業以內工人的力量是離心的，他們的鬥

爭是向內的，這是勞働運動中第一個難點。

(二) 行會色彩。中國行會有他們千數百年的歷史，不止手工業者一時不能變成近代式的工會，產業工人也受了這種極遠且久的行會影響。他們在一職業以內相互鬥爭，在一職業以外互相排軋。他們並不視工人是整個的，而視工人是分散敵對的。據我個人在廣州的經驗，一百件工人糾紛當中，勞資爭鬥不過是百分之二十，職工與職工爭鬥佔百分之三十，同一職業的職工爭鬥竟佔百分之五十。農工廳所做的的工作是『調停』和『仲裁』，總沒有時間去想出一個根本解決，這是勞働運動中第二個難點。

上述兩點，是工人運動根本的困難，我因為不是討論勞働問題，只好擱置而專批評我們過去的錯誤。

(一) 偏於軍事的投機。此種錯誤在農民運動中也表現不少。

凡革命軍事的進展，工人的擴大罷工，切斷鐵道和電綫，的確足以利益於軍事的勝利。十四年撲滅楊劉之役，兩次出兵東江之役，前年北伐之役，農工有相當的努力，這是不容湮滅。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不過是工人運動的必然結果，不能專以此為我們的目的。過去的工作，未免太重視這種軍事的投機，一若全個運動的目的都集中於軍事。於是工人忽略了本身的生產力而趨重於單純武力。『工人武裝起來』的呼聲，幾轟動於南方全部。據我事後的迴憶，當時縱沒有共產黨的煽動，這種現象也必不能免。因為我們既有軍事投機的錯目的，工人們自然有軍事投機的好奇心。所以工人運動最熱烈的區域，生產力也最速度的降下。很像一九一九年的意大利，工人們武力佔有工廠之後，離散的離散，惰工的惰工，純至生產消沉，反動因之而起。不以生產力擁護革命，徒以武力擁護革命，這是必然崩壞的。

(二)缺乏經濟的規畫。凡一個革命的成功，與於革命的人們，必起而要求本身利益，這是不能逃的事實。在工資低下的中國，縱使工人不參加工命，也會要求加薪；何況在軍事成功的當時，工人有了武裝作他們的後盾。我們在廣東時候，并非沒有預料到這種必然的事實，所以農工廳第一種工作就是從事於製作物價指數表和生活指數表，希望使工資和物價兩劑其平。我也知道工資和物價，斷難相齊，但總希望得一個相當的解決。惟是我們的指數，只可適用於廣東，長江的物價不同，工資物價一時沒有詳細的材料，遂使每一問題發生，都沒有可據的圖按。我且把廣州和上海的物價指數列在下面供我們的參攷：

## 廣州物價指數表

年數	米	其他食物	衣料	燃料	五金和建築材料	其他	總值
191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6	187.5	167.8	152.6	232.6	174.7	175.4	181.7

# 上海物價指數表

年數	米麥	其他食物	衣料	五金	燃料	建築材料	工業原料	其他	總值
191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6	165.3	166.9	136.9	154.9	145.0	132.1	143.5	130.9	145.6



照上表所表，廣州前年的物價比民國四年增高百分之八十一，上海則增高百分之四十五。去年的物價表，因為本年的年鑑還沒有印出，不能知道，可是有兩件事實可以推定一定更加增高，一件是新增關稅的二五附加，一件是工資的增漲。然而工人最低工資怎麼計算呢？中國還沒有這種材料，以外人的概算，上海最低生活每日是四角。在紗廠作工的家庭試舉兩個為例。第一個家庭包含一夫一婦和兩小孩，夫每月所得工資十五元，妻的工資十二元，他們的家庭預算表便是：

米五十斤 八元

菜 四元

燃料和油 一元五角

配菜料 一元五角

租金和納稅 二元

煙草和飲料 一元

衣服 二元

零用 一元

合計二十一元每月尙可存儲六元

第二個家庭只有一夫一婦，夫每月可得工資十五元，妻爲無業者，他們的家庭預算表便是：

米 五元

菜 四元

燃料和油 一元五角

配菜料 一元

租金和納稅 一元五角

衣服

一元

零用

一元

合計十五元每月絕無存儲

我們姑以第一個家庭說罷，兩元的租金是否可以租一間容住四人的房間？每年二十四元是否夠四個人的衣服？再如果有疾病，除了睡在床上祈禱上帝來救之外，更沒有請醫生的辦法了。但寫到這裏，我又流入於討論勞働問題，我且截住不說，轉而批評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應當在工人運動的當中，預先對於經濟作一個規畫，何項工人應當增加工資，何種工業經濟能夠容許工人至某程度的給與。我們從前的錯誤就是不問社會經濟的能力，單領導工人爲過高的要求。其結果工人得不到原始的要求，商人也得不到相當的滿意，無論工商皆以本黨爲怨府。工人則怨本黨的不澈底，商人則懷疑本黨舍棄商民。但今

日又流於第二步錯誤時期，只顧清共，而忘卻革命羣衆中，有大部分的工人部隊還在希望我們領導，可是關於經濟的規畫，還是依然像往日一樣，沒有一人肯注意呢。

(三) 忽於運動的步驟。換言之即是沒有計畫，我看這三年來的工人運動，在十五年以前，可以說是手工業者的單調運動，十五年以後更可以說是店員的單調運動。何以如此？最大原因在中國沒有大部隊的產業工人。我在鄂贛兩省六個月的經驗，一百件勞資糾紛當中，倒有九十件是店員和店東的爭議。本來店員和店東的關係就與工人與廠主的關係不同，作工的時間和工資的給與已經難得有一定的標準。我分析工人和廠主的關係，只有勞力換取金錢的關係，而店員與店東的關係，除了勞動和金錢之外，更有人與人的關係。今使每個商店有了內部的敵視行爲，不啻全個都市都陷入恐慌和疑懼的狀態。單

調的店員運動最足危及小資產階級的生存，拆散國民革命的戰線，工人運動的錯誤，實以店員運動爲主要的錯誤。

（四）濫用工會的權力。在廣州的工人運動，雖說有共產黨參加，但無論那一個工會對於國民黨及政府，受相當的指導和命令。自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後，各省未有本黨的悠久歷史和基礎的羣衆，都市的行政司法立法權差不多完全操之於工會。勞資爭議，工會往往以武力解決，不待黨和政府的仲裁；罰鍰，封鎖，逮捕更是極平常的一件事。這種特殊的舉動，除了省港罷工的特別情形以外，都在廣州沒有見過。如果工會可以統一命令指揮，那還說共產黨有他們的計畫，爲組織勞農政府的步驟，但最可憐的共產黨只知道攘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而不懂得實行可以攘得的領導權。總工會不能指揮各個工會，各個工會不能指揮各小組。樞紐鬆懈，全局皆入於無政府狀態。這麼一

來，不獨普通市民沒有保障，工人的本身也沒有保障。除了少數的所謂領袖們，工人皆視工會爲一個可厭之物，工人運動到了這一個地步，不止毫無意義，而且根本倒塌了。

(五) 沒有正當的指導。缺了正當指導爲本黨最普通的毛病，不通對於工運更易直接和迅速的降低本黨的精神。我只見同志鼓動工人去鬥爭，沒有見過胞志們指示工人一件正確的事實。我在勞資糾紛中見了許多奇怪的現象和條件。江西贛州的工人曾要求增加二十倍的工資，經兩個月的罷工沒有解決。當時指導的人也是一個黨員，我嚴厲的問他何以指導工人爭必不可得的利益，他說爲着革命去鬥爭，沒有注意到經濟的現象。漢口的酒館工人曾硬要店東簽定一個條件，凡宰雞時候，雞肉歸店東，雞的內臟要歸工人，其餘這種無意義的要求，不勝枚舉。在研究工人運動的人們，看見真是忍笑不住，惟是當

時號稱指導工人的同志，以爲再沒有比此更嚴重的事，非取得不行。概括言之，以前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們百人中間總沒有兩三個對於工人問題有深切的研究。

### (C) 商民運動的錯誤

據我觀察我們過去的商民運動，錯誤兩個字還談不到，其實原

始就沒有固定的目的。我們分析中央黨部和各省商民部所定的商民政策，除了一個商民協會組織以外，總看不出有其他的表現。商民部的工作往往不爲同志所重視，商民運動的經費，事實比任何部都要減少。我曾和商民協會一個同志談話，他說：『我雖然是一個商民協會的會員，我完全是一個無產階級，并專替無產階級謀利益。』他說這樣話，固然表示他同情於無產階級，可是以一個無產階級來組織商民

協會，不是胡鬧，就是投機，怎樣能了解商民的要求，和代表他們的利益？今日以前，我敢相信組織商民協會的同志們，十有八九的思想都是和我談話的同志一樣。我現在且指出幾種過去的錯誤。

(一) 沒有正確的目的。大凡一種運動，不論牠的方法好歹，最低限度也要有一個目的。過去的商民運動，最使人不能滿意的，沒有正確的目的。減稅是商民最迫切的要求，但因軍事沒有結果，沒有方法可以減稅，或者更要增稅。振興實業是商民最熱烈的願望，但因不平等條約還沒有取消，政府行不得保護政策。最低限度維持現狀和秩序是商民的普通心理，但因爲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連現有的利益也要減少。商民最是講究唯物論的人們，不能學唯心論的哲學大家，人憑着熱情去革命。於是担負商民運動的同志們，便旁皇無主，始終沒有定一個運動的真正政策。



(二) 沒有經濟的建設。我常說如果要實行民生主義，同時要建設國家資本，增進社會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今日建設國家資本尚非其時，增進社會資本尚茫無頭緒，現在所急待討論的就是在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還未發展的時候，要不要節制私人資本？我相信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必定有人說我違背總理主義，或者是開倒車。可是我們明白，經濟是政治之母，經濟的變遷，就是革命的消長。舍了經濟，不獨不能談政治，而且不能談革命。更簡單說，要維持革命的力量，先要鞏固武力；要鞏固武力，先要充足經費。經費的泉源是稅款，稅款的泉源就是生產和消費間的交通稅罷了。

我們爲什麼要節制資本？因爲恐怕革命的結果流入於資本主義。中國能不能變爲資本主義？視私人能不能壟斷全國或一部的生產消費和交通。比較可以生產的漢冶萍公司破產了，勉強可和外人競爭的南

洋煙草公司朝不保夕了，僅分得交通利益的招商局輪船公司早沒有辦法了。私人所有的廣州粵漢鐵路和江西的南潯鐵路早看不見股東了。除了以上幾家稍有組織的公司，我更找不出能夠壟斷生產消費和交通的私人。所以目前要維持粗糙的社會組織，對於私人企業是不是要有系統的獎勵法，是很值得討論的。

大概一個社會的經濟組織，大別爲生產，消費，交通三大項。中國的生產是零碎的，消費是散漫的，交通是片段的。對外貿易，茶佔百分之十三·二七，絲佔百分之十八·七一，可是沒有一個公司壟斷這種絲茶生產，政府也沒有政策獎勵和保護這種生產。國內消費要算棉布爲大宗，棉貨佔入口貨物百分之三十二·八五，但是這大宗的消費是操於外國的公司，交通則航行外國的并無一艘輪船，內河輸運也漸漸爲外國公司所佔領。在這種形勢底下，中國實在無變爲資本主義

之可能，現在有許多同志恐慌中國的革命或者轉入資本主義的道路，我經過深久的觀察，只有請這班同志們少當些心罷。所以就我個人的意見，如要做商民運動，最要使他們了解本黨的政策。在革命勢力所到的地域，在國家一定計畫之下，應該獎勵私人資本。出口貿易，國家應該設法壟斷，但在壟斷之下，以百分之四十容納私人，舉而至於農業，則提倡大農作，對於工業，則提倡大企業，然無論那種企業，都以百分之四十，容許個人的投資。或者我這番議論，駭人聽聞，可是不如此幹法，不獨無法作商民運動，而且根本建設不起國家資本。

（三）誤於分化的鬥爭。不客氣說，國民黨對於商民運動的冷淡，第一鑑於廣州商團的敵視，第二商民本質屬於小資產心理，革命之性不強。而且城市的資產階級，十分之七居於外國資本主義者的零賣商，他們在帝國主義未倒之前，不會抬頭，但當帝國主義要倒的時

期，本身極受損失的影響。例如去年帝國主義總退卻之時，長江流域的工商兩業一齊停頓，直至影響及於政府和社會的經濟。因為這個原故，多數商民對於革命是否有利於本身，非常懷疑，而黨內對於商民運動的政策，也中道徘徊，舉棋不定。

商民協會的組織本欲聯絡中小商人以對抗大商人，但在中國產業未有發達的國家，大商小商至難分界。我們硬說小商人革命，大商人不革命罷，則小商人保守心理有時反較大商人為強。況且大商人的資力強，小商人的資力弱，無論政府舉辦一事，新增一稅，都是小商担負小而大商担負多。發行公債，舉募借款，都與大商有關，由是黨和政府更與大商接近時多而與小商接近時少。表面商民協會是黨指揮的機關，實質舊日商會在政治和社會的勢力都佔優越。這種矛盾的事實，自己迴想，也很離奇。雖然在許多事實上，大商壓迫小商，但不

心分析他們的經濟，實際沒有很清的分野。這種非科學的分化組織，也是我們錯誤之一。

(四) 忽於職業的指導。商民運動的用語，當然包含自由職業在內。我以爲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止存在於其特有的社會『交換』性，除交換性以外，還有社會『補助性』的特質（詳見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過去雖日高呼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而對於商民大都聽其自生自滅。凡經破壞一處的地方，生產和交換必然停頓，而我們對於這種生產和交換的恢復，沒有過相當的政策。我所謂政策，自然不是說政府補助金，其實政府目前也沒有方法補助；但對於商民的交換和補助的特性，應該盡量發揮。例如該地的生產和消費特點，政府應當立即注意，對外貿易的操縱，政府和商人應當合作想出一個通盤的計畫大綱。我們要知道今日的社會經濟和往日不同，亞丹

斯密的放任政策，不止歐洲大陸早已擯棄，航是亞丹斯密的祖國英國，也漸由放任政策而改爲干涉的政策。今日我們如果聽其自然，第一工商兩業，無法復興，第二建設國家資本的計畫也失其根據。

我對於農工商的運動，還是主張我從前提出的計畫。

一，對於工人，要擴大國有產業的範圍，吸收廣大的工人羣衆，使成爲社會生產的一員，不使之構成私人生產的工具，單純變爲受壓迫的無產階級。

二，對於農民，要經營大組織的國有電氣和水利事業，使農作完全受國家企業的支配以增加生產，逐漸消失其私有性，使單純變爲社會生產之一員。

三，對於商人，要單純發揮其職業性，成爲經濟構造和社會構造上輔助生產的工具，必使之消滅固有階級性，而與農工同立於生產地

位，不使之居於掠奪者的地位。

### (D) 青年運動的錯誤

青年運動發展於『五四』，全盛於十四五兩年，破產於今日。我爲此說，必有青年很憤慨的詈我爲謾罵，詆我爲刻酷。但我們仔細觀察現存的事實，青年運動年消沉到了零度。獲得政治地位的青年多數已經腐化，未獲得政治地位的青年正在徬徨四顧，各尋個人的生活，猶在學校的青年，除有時鼓動罷課反對教職員以外，寂靜無聲。何以有這種現象？自然裏面有種種原因。革命的矛盾，政策的飄搖，黨部的分裂，局面的反動，在在足以使一班青年煩惱，沉悶，灰冷，憤慨，僥倖，投機。雖然各種心理因於個人環境而不同，可是青年運動已到了一個絕望境地是大家所承認。大概過去的青年運動，也有青年

本身的弱點，也有我們自己的錯誤。

一，偏於學生的運動。照理論上青年運動當然指一般的青年，但事實上我們所謂青年運動，完全是狹義的學生運動。本來學生絕不能成一個階級，他們也沒有獨立的經濟特性。在校的學生一百人有一百人利害的不同，出校的學生一百人有一百人出路的各別。壓迫於軍閥底下的學生，他們還有一個政治為對象，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學生，對象既失，遂移轉活動方向，以學校內無聊瑣屑的事情為對象。不但如此，學生知識比尋常的農工商青年為高，而其經驗却比普通的人們為少。一方面他們的行動既不能平民化，而一方面他們的經驗却不能深入羣衆中。在經濟無特殊的基礎，而在地位變為社會中一個特殊階級，這是多麼的危險。他們的行動純粹靠一時的熱情，及熱情既過，各人便各自尋出路。偏於學校的運動是我們的錯誤，沒有經濟組織是



青年時常崩壞一個原因。

二，誤解羣衆的意義。單調的學校運動，已失青年運動的意義，由此一誤遂誤到不能補救。學生思想，常常爲革命的發動機，而維持革命的力量，則不能不靠普遍羣衆的擁護。因爲學生接受新思想最先，自身未受社會生活的束縛，能願犧牲的意志極烈。但其本身不成一個階級，因爲環境的變動，思想意志也隨着動搖。過去的同們，很多未了解學生的本質，以爲學生就是羣衆。前年在北伐之始，路過長沙，我在省黨部作政治和黨務的談話時，對湖南的同志們，曾提出個人的經驗，反覆商榷。因爲湖南的學生運動比任何一省的成績，都極可觀，我因爲要維持湖南的過去成績，不憚反復致意，告訴他們以後要把學生運動轉而爲普遍的青年運動，才可以不致中斷過去的工作。同志們既誤解學生卽爲羣衆，於是學生當中各找羣衆而成的

四分五裂的現象。無論那一個學校，最少分成三派，一派是左傾派，一派是右傾派，一派是中立派。實際觀察，除了中立一派，也無所謂左右傾，只因領袖的爭持而自成一系罷了。一個學校如此，一省的校團也如此，我常說青年的分裂，先於本黨的分立，而青年的分裂也足以影響於本黨的分立。設使青年運動不專於學生運動，又設使學生運動不流於『抓羣衆』的運動，本黨也不會形成這個現象罷。

三，獎勵投機的心理。學校當然是儲才之地，否則各國也不會辦學校。學生在受學校教育的當時，當然兼顧到社會教育，否則單調的學校教育不會適應社會的需要。可是同時有一個注意之點，即是一個未成熟的學生而出任社會的運動，在學校是戕賊教育，在社會是擷殺人才。共產黨既以黨勢不張，急於擴大，遂想出一個擷而長之的辦法。他們的祕密運動初還專在專門學校，再則以爲不够，運動到中

學了，再更以爲不夠，運動到小學裏了。共產黨既在學校抓羣衆，反共的同志們也不得不在學校抓羣衆。運動要經費，領袖要津貼，此風一開，任何學校皆變了鬥爭的場所。我於去年初回廣東的時期，共產黨雖然清去，然學風竟無收拾的方法。以廣東中山大學而論，小團體的名目竟不能以數計。同是反共，有左右派之分，而左右派之中又有人人的系統之分。往往十餘青年，自成團體，任其分立，則各自鬥爭；強而使合，仍自紛擾。攷其實際，則各有領袖，表面求出路，實質待善價而沽。學校當局有組織，強有力的職教員有組織，學生本身又有自己的組織，青年運動的結果如此，不能不令人慨嘆。各省的情形怎麼樣？我雖不能深知，但誰都可斷定有同一的現象。

四，破毀學校的目的。學生既有了投機的心理，自然不能整飭學風，一切學校，形同虛設。從前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批評，好處

在惹起革命的導火綫，壞處在低降青年的求學心。北京大學自從五四下了一劑興奮劑，青年求學之心至今還不能恢復。北方現在我不說，凡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教育至今沒有確定的方針，學校至今沒有健全的組織，青年至今還沒有恢復求學的興味。破壞革命的時期已過，建設的革命就不能不儲材。我們也知當革命緊張的時候，人皆捨棄固有職業而希望新的將來，心理正在時時劇變，尤其是青年不願枯守書本，也是今日必有的現象。不過要保持革命的恆久性，青年運動應該別採一個方針，否則破壞時期已過，青年的學問不足應社會建設的需，必有一日社會顯出崩潰的危險。

末了一句話，偏於學校運動是青年運動一個大錯誤。青年的學生是革命的，但我們應當防止其革命的投機性而保持其革命的恆久性。在青年當中抓羣衆的辦法，不止墮滅青年的革命恆久性，并且足以破

壞革命的將來的。

### (E) 婦女運動的錯誤

在依然農業時代的國家和封建制度未完全崩潰的時候，婦女運動比任何運動都更困難。現在婦女運動只是初期，僅是黨內的運動而非普遍的運動，僅是都市的運動而非農村的運動。所以現在的婦女運動可以謂之局部運動和超時代的運動。論到婦運的本身錯誤是很少的，不過沒有運動的成績。

婦女運動至今尙未能發展是一個事實。有一次何香凝同志和我討論，問我有什麼方法可使婦女運動發展，我答她說：除非社會已變了工業化。婦女在世界上處於一個被壓迫的位置，誰也承認。在社會的地位低下於男子，在道德的規律刻酷於男子，這不僅是歷史的遺傳，

這是經濟的背景。都市婦女比較農村婦女爲自由，因爲都市婦女有容易生活的機會。而且都會多數工業化，沒有農村艱於求妻的困難，所以同時也減少以『妻』爲『物』的保守觀念。譬如關於戀愛問題，我就很少討論。因爲這不是唯心的問題，還是唯物的問題。在工業化的都市，無論我們日日提倡孔學，高呼禮教，結果還是戀愛自由。在農業的鄉村，無論我們日日介紹自己戀愛的學說，結果還是離婚罪惡。今日婦女運動有沒有錯誤呢？我以爲也有我們的錯誤，也有時代的錯誤。

一，缺乏實行的決心。黨內雖然屢然決議，承認婦女的地位平等，民法始終沒有規定女子可以承襲遺產的明文，刑法也沒有科過黨員重婚的罪罰。例如買賣婦女，無論黨部政府都會決議或用明令，嚴禁蓄奴；據我所知，普通人不用說，黨員當中蓄婢的就不在少數。所以今日的婦女運動，可謂全黨都沒有決心。宣言決議，只成具文。語

其成績，不過黨部多一個婦女部，各地多一個婦女協會。有些同志對我說，今日的婦女運動不過是『太太運動』。這句說話雖然是有憤而發，但婦女運動并不能算是普遍運動是一件事實。

(二) 忽略經濟的背景。大凡一種革命性的運動，其運動的是質，必有一種經濟的要求。中國婦女運動最困難的就是沒有經濟的要求，縱有要求，不過是個人的貧乏，而不是階級的困苦。婦女的地位恰與青年的地位相同，每個婦女有每個婦女的環境，每個婦女都有每個婦女的特殊家庭。而且中國婦女還處於宗法社會地位，普通婦女只算家庭工作的一員而不是社會工作的一員。未結婚的女子，以父兄的經濟為經濟，既結婚的女子，以丈夫的經濟為經濟。因為經濟沒有利害一致的基礎，婦女運動沒有方法可以發展。我為什麼說婦女運動為局部的運動，因為運動的範圍，也和青年運動一樣偏趨於學生。我為

什麼說婦女運動爲都市的運動，因爲運動的地域，總難深入農村裏面。婦女運動既沒有一定的經濟背景爲他們的要求，於是她們便以家庭爲運動的對象。更有困難的就是婦女個人的地位，太相懸殊，能夠取得社會地位，萬人之中恐怕不到一個。例如在都市裏面，大多是醫師和教員，職業既有所限，運動自不能擴大。所以有人問我什麼婦女才是婦女運動的羣衆？這個問題我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答覆。

三，偏重婚姻的問題。婦女運動的要求，在過去的工作，有教育平等，職業平等，法律平等的爭鬥。教育平等一個問題，各學校算是開放了，但中國的學生人數，在全人口中，和世界的各國比較，算是少數的少數。說到婦女的就學人數更是不多，有入中學和大學求學資格的婦女們，就是學校不爲婦女開放，也有求相等教育的機會，所以談到婦運，與其說教育平等的要求爲重要，不如說義務教育的要求



爲更重要。但是現就各省的經費來算，教育經費僅佔千分之三而強，離義務教育的問題很遠很通。職業平等的問題，我在上文已經說過，只有醫師和教員爲婦女僅有的職業。政府機關雖間有僱用女職員，但只是應婦女部的要求，而非機關本身所需要，在各大工廠自然有許多女工，惟是這些女工常爲工業的副手而不是主要的職務，簡淺點說，他們的僱用，不是因爲技術的熟練，而因爲工資的低廉。除此以外，雖有多數從事於家庭的手工業，不過僅爲家庭預算的補助，而非有一種有組織的經濟。法律平等的問題，我早說全黨的黨員沒有實行的決心，鬥爭至今，猶是像從前的『九年預備立憲』。這三種鬥爭，既然有些因爲本質的妨礙不能擴大，有些因爲環境的妨礙不能擴大，於是戀愛自由和婚姻自由的運動遂高於鬥爭的一切，現在社會的心目中以爲婦女運動單以戀愛自由和婚姻自由爲目的。不錯，自有婦女運動以

來，在黑暗家庭解放出來的婦女的確不少，這個成績，不能不算偉大。不過在社會沒有充分的職業爲婦女生活，初解放的婦女沒有經濟的組織作她們奮鬥掙扎的武器，因而此墮落的也不是少數。然而這不是婦女運動的本身錯處，是整個社會的錯處。但還有一點我們應注意的，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並不是婦女單方的要求。倘使爲婦女單方的要求，是否有今日這樣沒有成績的成績，我們還不能保證。

四，欠缺忍耐的奮鬥。在國民革命時期，不止工農運動與商民運動衝突，工人運動也會與農民運動衝突，即婦女運動與農民運動也有顯著的衝突。農業社會以婦女爲『物』的觀念，不止是歷史傳統的壞觀念，是在經濟上得『妻』的困難。婦女運動的趨勢既以自由結婚和自由離婚爲運動中一個重要主張，於婦女與農民運動中間遂發生極衝突的現象。湖北農民協會很有幾次圍攻婦女協會，河南的農民也有

幾次屠殺婦運的人員。就這種事實推論，可知我們根本缺乏運動的策略和宣傳的人材，并且缺乏忍耐的奮鬥性。農村情況既與都市情況不同，我們應得要另定一個農村運動的策略，譬如家庭衛生運動，婦女識字和手工運動，婦女放足運動，應作為運動的第一期。男女公開交際，自由婚姻，應作為運動的第二期。自由離婚，經濟平等，應作為運動的第三期。倘使沒有第一期的工作，突然去到農村宣傳結婚的自由，令農民懷疑『公妻運動』還是小事，令農民懷疑本黨整個的政策而不信任本黨，致使國民革命失了力量，這是一件重大的過失。

其次婦運的同志們都缺乏宗教性的忍耐。任誰跑入農村，都剪了髮，穿了都市的服裝，尤其好奇的全副武裝，裹上幫腿，掛上皮帶。這種行動，絕對使農民不能接受。我并非反對婦女剪髮，可是為要深入守舊的農村，喚起受困苦的婦女，第一期的工作，我們須要忍耐和

吃苦的。並且作農村婦女的運動，絕不是暫時的宣傳，實是恆久的工作。並不是開一個婦女聯歡會，演一次說便快步走，可以收功；還得要學傳教師有安居農村的時間，幫助農婦的工作，在必要時還要學從前的外國教士蓄辮髮穿長袍子才有效果的。

### (丙)政治訓練的錯誤

政治訓練雖只有五年的歷史，這不能不占黨史重要的一頁，綜合起來，可以成一本專書。軍隊的政治訓練，開始於十三年的黃埔學校黨代表制，而最終決定於十四年五月的中央決議。八月軍事委員會成立，同時設立政治訓練都，由第一軍至第六軍的黨代表和政治部也跟着設置。當時最大的成績，第一把零碎的軍隊整飭成整個的軍隊，第二把搖動的意志統一成堅確的意必，第三把非黨的軍隊形成黨的軍隊。

第四把軍隊的意志溝通人民的意志。統一廣東和第一期的北伐，若完全歸功於政治訓練，那便流於夸大，但政治訓練是軍事成功之一事，是不能磨滅的。可惜當時碰了一件最不幸的事，做了一件最大錯誤的事。

一件最不幸的事就是共產黨要極力擴大黨勢，而苦於沒有充足的軍事人材，所以把能夠工作的黨員都盡量滲入軍隊裏去，六軍的政治部，共產黨員佔了五軍。最大錯誤的事是把軍隊的黨部組織和指導，完全集中於政治部，當時大有『政治部萬能』的傾向。以一個極新而幼稚的制度，付託以最重而且大的責任，捉襟見肘的地方，自不能免。今日政治訓練到了一個破產時期，軍隊對於政治訓練不止不信任，且要拒絕；民衆對於政治工作人員不止蔑視，而且厭惡，溯本尋源，一件不幸的事和一件最錯誤的事實爲厲之階。至於政治訓練的錯

誤，我可以略舉如下：

(一) 宣傳不統一 黨的宣傳不統一，黨要渙散，軍隊的宣傳不統一，軍隊要崩壞。當政治訓練之始，各部隊爲要爭『緊張』的美名，任何一軍都有自己的刊物。其中也有專宣傳馬克斯和列甯主義的，也有誤解三民主義的，也有竟直不解主義的。政治訓練部也曾下了幾次命令，統一和取締，但因爲範圍的擴大和交通的阻滯，沒有過切實執行。附近廣州的軍隊，尙可直接受訓練部的指揮。至東江和南路的軍隊，動輒離省十餘日程途，事實上不能指揮如意。後來北伐以後，這個毛病，更屬顯著。當時縱使沒有共產黨的反宣傳，政治訓練也難得圓滿的效果。

(二) 人材不充足 人材不夠爲本黨同志平日所最引爲疚心之事。但在別的地方用非其材，還容易補救，在軍隊裏面用非其材，弊病即

刻發生。在政治訓練的開始時期，本已慮到此着。可是計畫是一件事，時間是一件事。最初訓練一百二十人的政治工作人員，開學不上兩星期，便全數調赴第二次出兵東江前敵了。後來黨內鑒於政治工作人員的不足，黃埔學校改而為政治軍事學校，特別設置政治班，可是不到畢業時期，又調赴北伐的工作了。自北伐以後，政治訓練的範圍愈廣，工作破產的顯露也最先。經過訓練的人員不够，調及軍校未畢業的學生；軍校未畢業的學生不夠，徵及普通學校的學生。在軍隊政治工作的同志，別的不說，最大特質，全在刻苦和耐勞。未經軍隊生活的同志們，一入軍隊，無處不暴露『不適應軍隊生活』的弱點。革命軍佔領長江流域以後，政治工作人員的流品益復不齊，很像誰穿起軍服，都可以做政治工作。這麼一來，政治工作的效率已降到零度了。

(三) 範圍太擴大 在上文我曾說過，以一個極新而幼稚的制度，

付託以最重而且大的責任，是我們的錯誤。但還不止此，北伐開始的時候，凡軍隊佔領區域以內，中央更付政治部以組織黨部和任免官吏之權，範圍一大，政治部的本身，已忘了固有的工作。他們忙的是地方黨務和行政問題，訓練士兵的工作，他們已經撇在腦後并且是沒有時間了。到達長江以後，民衆團體也歸政治部的指揮，政治部對於人民可以逮捕，罰鍰，監禁，甚至處決。政治部彷彿政府之外，復有政府，黨部之外，復有黨部。系統一混，流弊遂不勝言。去年九月我來上海之時，有同志告訴我，竟有以政治部的勢力作他們敲索奸佔的武器，政治訓練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有何說！

（四）運用太錯誤 我們要知道政治訓練爲黨的工作，不獨政治工作人員的能力，歷史，個性，關係要清楚，就是所訓練軍隊的情況——軍官，士兵，武器也要清楚。在廣東出發的當日，軍隊的名目是七



軍，但實際不過十三師四旅左右，至湖南才加上第八軍的三師，惟到了長江以後，連新編暫編的何止六十軍。在作戰的當時，爲減少敵人力量計，自然不限於運用何種方法，可是軍事的運用和政治訓練的運用不同。今則不問新編何軍，不問其情況如何，都派去一個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語其結果，要求派遣黨代表政治部是軍隊對於黨的敷衍；派遣黨代表政治部到軍隊去是黨的應酬。這種制度久已成了告朔餼羊，毫無意義。客氣的軍隊當黨代表和政治部是一個顧問，禮以上賓，不客氣的軍隊待黨代表和政治部像一個了無關係的外人，并副官之不若，說到工作和經費，只有推諉，極其量稍稍應酬罷了。

關係政治訓練，我很想找點時間另著一節專論來研究；過去的錯誤，今且概述於此。本來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黨內經一度的分裂，即互信不生。在今日人不互信也不信黨的時期，政治訓練確無從做

起。加以在革命途徑中有了許多矛盾，尙未解決，就使加緊政治工作，其得不到良好的效果，也可預期。年去九月我到南京的時期，政治訓練已縮到過猶不及的低限。我曾問過一個武裝同志，『如果以爲尙可工作，應該擺大，如果以爲不能工作，應即取消。若縮至不能工作的範圍，只有壞結果而無好結果』。這個同志沉吟一回，答我說：『貼標語總要找人罷！』政法訓練的工作就只是替軍隊貼標語嗎？今日政治訓練的情形可以想見了。但是政治訓練的新方向在那裏？負軍事責任的同志們應該很沉靜的去想想。

.....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我雖不敢說很詳盡的指出，然已不是惰糙的臆斷。但過去的錯誤，我應當在同志中負較大的責任，除了黨的運用的錯誤，我難單獨負責外，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

動和政治訓練的錯誤，我應當至少負十分之九的責任。我的同志們，國民革命的危機是要挽救的，我們的錯誤是要糾正的，我大胆地指出我們的錯誤，并承認我個人的責任，但同時我不贊成今日的同志矯枉過當，以『錯誤』改『錯誤』。黨至今日已沒有出路，各省對於中央已成了割據的獨立，黨員對於中央變了散渙的自由。現在黨內除充滿了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之外，找不到三民主義，黨綱，政策，中國國民黨今日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黨的改組』。一切的忠實同志們應團結起來打從民國十三年重新幹起。

## 附 記

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發表前後，海上——或者還有南京——的人們，有人說我要組織第三黨，有人很懷疑我所說的『革命立場』。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已宣佈於我的短文中，獨至『革命立場』，至今還有人懷疑不息。我今天偶翻起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他在序文有幾句話『如果把整個中國忘記了，把全國國民忘記了，只記得一個黨字，那便是莫大的罪惡。』誠然我對於戴先生的青年之路，有暇還想作一篇文章和他商榷，不過他這幾句話，確和我的意見相同。我很奇怪的，何以人們對於季陶先生不批評他脫了黨的立場說話呢？末後我重復自解，大概這話因許是季陶先生說的這一個緣故罷。如果有工夫，我想再作一篇『再論革命的立場』，現在先把『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和『我所謂革命的立場』附錄在這本小冊子之後。

公博五月十六日於上海。

## 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

近日上海組織第三黨之說，甚囂塵上。第三黨的綱領是什麼，大家還不大清楚，而對於組織第三黨人物的揣測，聰明的西山會議派同志們以爲是汪精衛陳公博——見之再造旬刊；另一派的先生們以爲是鄧演達和已經脫離共產黨的譚平山施存統——見之戰綫週刊。據我所知，汪精衛先生不獨沒有這回事，恐怕還沒有聽見這回事。鄧演達和譚平山我不知道，施存統先生就沒有這回事。那裏來的第三黨？恐怕大家還是在於蘊釀，揣測，和期望。我們還不知綱領，人物，而先有第三黨的呼聲，這是黨先於綱領，違反先有綱領而後有黨的原則。不過人們或許有第三黨的要求，這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第三黨名稱的來源，我記得還在武漢去年六七月的時候。當武漢國共分離的初期，國民黨固然起了小變化，共產黨也在那裏起大變化。當時主張組織第三黨的約有兩派。一派是共產黨的理論，主張以還是傾共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合組第三黨，所以七月十三日共產黨發出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一面仍訓令黨員秘密盡量加入國民黨，不論任採如何方法以得登記爲止。一派是鄧擇生的理論，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而將共產黨的綱領採入國民黨，使中國僅有一個黨，但仍受第三國際的支配。

可是目前形勢與第三黨來源的當時形勢絕對不同，共產黨主張以暴動方法來建設他們的蘇維埃，對國民黨完全採敵視的態度，目中已無第二黨，更談不到第三黨。鄧擇生在莫斯科仍主國共合作，受了蘇俄譏笑和冷酷的批評，所謂取消共產黨，可謂完全不能實現，也談不

到第三黨。所以現在所謂第三黨，是社會民主黨還是第二國民黨？我很難揣測。

當我在武漢時候，對於第三黨的組織，以爲理論行動，都足危及革命的前途。對於第一派理論的批評，已詳見我所著『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茲不贅述。對於第二派的批評，我也曾和鄧擇生經過好幾次的辯論。我以爲要取消中國共產黨而把國民黨重組，有幾點不可能。第一我始終相信中國國民革命自有牠的立場，并非籠統概括說可以受第三國際的支配。第二中國國民革命即世界革命一部分，其特質在領導東方民族反抗帝國主義，而非在於與蘇俄聯合這樣簡單。第三蘇俄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使用，自有其政策，斷沒有自甘取消整個一黨而併合國民黨之理。第四中國國民黨有牠自己的使命，歷史，立場；如果採取共產黨的綱領，那麼何不單要共產黨？國民黨何

必尸其虛名，離其立足點？第五實際來說，國民黨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恐怕還要待諸很遠的將來，若再加上共產黨的綱領，豈不是此路已經不通，更要裹足恐其前進。

不但如此，無論任何一個革命黨，最低限度必包含兩個作用，一個是推翻現存的政治，一個是建設未來的理想。因為不滿於現存政治，所以有未來理想的建設，因為要建設未來的理想，所以要推翻現存政治。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是國民黨推翻現存政治的手段，實行三民主義是國民黨未來理想的建設。國民黨的過去工作，只實現推翻現存政治的一部分，始終沒有着手建設未來的理想。在整個黨還在革命進行時期，還未暴露未來理想不滿或錯誤時期，於此而要另組第三黨，說理由是空泛，說時期是過早。

其次說到一個黨的革命和不革命，我們不當視黨的個人，只要視



黨的綱領。今日國民黨在四分五裂時候，誠然我們要找一條出路，可是這條出路是整個黨的出路，不是我們個人的出路。我不能贊同共產黨的說話，說三民主義不澈底，因為我看不出共產黨專政蘇俄的國內一切政策是澈底，更看不出中國共產黨的四處暴動——殺和火——是澈底。我也不能贊同帝國主義者的說話，說國民黨是過激，因為我看不出帝國主義在尼加拉瓜摩洛哥用大砲去掃射土人不是過激，尤其看不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用機關槍掃射羣衆和礮擊無防禦的城市不是過激。要而言之，在國民黨不取消三民主義以前，我絕對肯定中國國民黨是革命黨，并且是任何一人也不能否認牠是一個革命黨。所以在三民主義國民黨擔負革命使命的期中，我否定有組織第三黨的理由和必要。

不錯，在今日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我們看不見對外有鮮明的政

策，我們看不見對內有確定的主張，民衆更看不見自己有實際的利益；但這種失敗完全基於革命時期不可避免的矛盾事實，而非基於國民黨本身主義和政策的不對。要之今日使無數羣衆感覺空虛，煩悶，冷淡，失望，只是在於國民黨的人的問題，而非在於國民黨的主義和綱領，這是我根據客觀事實所敢斷言的。

可是今日中國國民黨是否仍合一個革命黨的條件，這倒是一切忠實同志所應討論的一件事。去年九月我剛離武漢之時，曾一度提出黨的澈底改造，及至十月在預備提案的當時，再度提出黨的澈底改造。換言之，就是國民黨到了今日，自十三年改組至今還沒有檢閱過的本黨，實在有改組的必要。現在除了我們主張之外，還有許多派方法同而目的不同的意見：

(一) 最足形成黨的破裂，要算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會，而現在

的中央黨部還是根於代表大會而來。要形成黨的眞團結，非把這個不可靠的法統打破不可。其次清黨不止要清共產黨，最要緊還要清準共產黨。汪精衛等雖然不是共產黨，但可以說是準共產黨。他們雖然在武漢分共，但我們仍然要說他們接受第三國際的陰謀；他們雖然在廣州共產黨暴動當時受共產黨的攻擊，但我們依舊要說他們是苦肉計。我們爲要清除準共產份子——和我們意見不同的一切份子，所以顯明的主張黨的改組，這是西山會議派大部分同志的意見。

(一) 國民黨的組織，大都脫胎於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訓練過於束縛黨員的自由；會議用大多數通過是多數壓迫少數的方法。所以黨紀可以不談，會議可以不用。縱使開會也應當以談話式出之，對於各級黨部也應爲另一方式的結構。這一派雖沒有顯著的標出改組的意義，實已充滿了改組的精神，這是幾個中央老同志的意見。

(三) 黨只是一個紙老虎，中央更虛有其名而沒有希望，惟一方法，只有地方黨部組織嚴密，然後再聯合數省而另組一個中央。兩湖只有弄好兩湖的黨部，兩廣只有弄好兩廣的黨部。到了相當時期，再行團結而組一個强有力的中央。這一派雖沒有明白叫出改組的名詞，卻在那裏開始了明顯的改組行動，這是幾個奄有一個地方的武裝同志的意見。

無論任何一派，雖然他們的意見不同，可是他們對於『改組』之要求則一。所以目前主張黨的改組，已不是一部分人的要求，而是普遍黨員的要求，不過意見和行動，有些是明顯的，有些是暗昧的，有些是整個的，有些是局部的罷了。

我為什麼主張改組黨？我的意見和各派都不相同。我不是第一派，因我還可以喚做一個法統派，我還是贊同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

精神。我也不是第二派，因我並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我還主張以後更要較嚴密的組織。我更不是第三派，因我不贊同黨的『分治合作』，而極端主張黨的狄克推多。我的主張，簡括言之，就因黨已充滿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黨的組織，早已等於無有。目前黨的分界，在地方最低限度形成五個地方的集團，在個人可以說化分爲無數的小團體。在每個集團之下，中央黨部簡直不能過問，黨部只有隨地方軍事行動爲轉移。在每個小團體之內，個人意見紛歧至於不可名狀，人與人的衝突竟無法使之統一。照着這樣分割，我們再不必談三民主義，就是黨的生存，也缺乏了必要條件。

我以爲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的建設，應得注意兩件事。第一是建築國家資本，第二是泯除不平階級。可是這兩件事的發動機完全在於『黨的專政』。像今日支離破碎的局面，黨的專政，無法實行。從最

好方面去觀察，至多僅足做成民主主義的國家，斷不能做成民生主義的國家。從壞的方面去觀察，必做成割據地方的軍閥，更做成連綿不斷的內戰。今日的國民黨情況正與辛亥以後的國民黨情況相同。除了每次開會恭讀總理遺囑以外，我只看見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我更看不見本黨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國六年時候，很有些人，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但今日的負責同志，連問題也不想談，很像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好了一樣。我們爲要實行民生主義作最後的鵠的，所以主張黨的專政；爲主張黨的專政，所以要健全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爲要健全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所以要掃去破壞本黨的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主張黨的改組。

四月十五日

## 我所謂革命的立場

什麼是革命黨的立場？革命黨的立場是革命。什麼是革命的立場？革命的立場是民衆的要求。但我們要知道：

革命黨的組織是爲着民衆要求而產生，  
革命黨的政策未必與民衆要求相適應。

我爲什麼說革命黨的組織是爲着民衆要求而產生，我可以引我在『國民黨代表的是什麼』面幾句話。

『我們要知道革命是客觀的需要，決不是主觀的需要。如果人民不需要，光是幾個革命黨在那裏提倡革命，永遠不會成功的。反之如果人民受了政治和經濟的壓迫，個個在那裏希望革命，即使我們不起

來革命，自然有人起來革命的。

『我們爲什麼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於此必有人答我，說因爲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變了半殖民地：中國的領土被人佔作租借地和租界了，海關是握於外人手裏了，司法已給領事裁判權破壞了。但總結一句，帝國主義者爲什麼要這樣幹法？不外要中國作他們銷售物品的市場，吸收原料的寶藏而已。我們要知辛亥革命的原故，他不具論，可以看看截至辛亥的負債表。（表略）』

『截至辛亥未革命前，中國負債已有一十四萬萬兩。照一九〇一年改兩爲元來算，每圓等於七錢二分，便是二十萬萬元，……除了中國所負的鉅額債款和利息，清廷所謂練新軍辦學校的維新經費，預備立憲經費，比較原來的支出算至宣統末年超出十倍以上。再加上海關出入口貨的損失又是二萬萬元，已真是民不聊生了。』



『試想中國本是一個農業國，經濟是靜的不變的，驟然增加人民二十餘萬萬的負擔，而海關又爲不平等條約的國際協定稅率束縛，動彈不得，一錙一銖皆取之於民，於是天下騷然，羣思革命。』

『當時要改革的，大要分兩派，一派是革命派，以同盟會爲領導；一派是改良派，以康有爲梁啟超的憲政黨爲領導。甚至鄉村的老太太也搖頭太息於天下之不寧，靜坐着希望真命天子降生。平情論之，憲政黨爲什麼要維新？不過要革命。北京好好坐着宣統皇帝溥儀，鄉村老太太爲什麼還要另生一個真命天子？也不過要革命，要求經濟解放，不過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武漢一呼，天下響應，不百日而清廷以覆。後來秉筆記史的，自然免不了藻飾大勛，揄揚鴻業，歸功於國民黨，然而我們承認客觀事實的，卻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成功這樣容易，還是羣衆要求的緣故罷。』

歸納來說，如果民衆不感受經濟的壓迫，決然沒有感覺解放的要求，沒有解放的要求，決然沒有革命黨的組織。從事革命的人們萬不要以爲自己是大慈大悲來救世，其實自己就是要求解放的一個。我們更遠一點觀察，撇去宗教觀來觀察，如果沒有羅馬征服地中海各地，壓迫和蹂躪弱小民族，基督不會產生而且成爲宗教罷。

.....

我爲什麼說革命黨的政策未必與民衆要求相適應。我常說革命黨最低限度有兩個作用，一個是推翻現存的政治，一個是建設未來的理想。民衆要求解放才有革命，所以推翻現存政治是一切革命黨所相同，可是建設未來理想，因人們觀察有深刻和膚淺之不同，就非一切革命黨所能一致。辛亥革命以後，同盟會就崩潰成爲無數小政黨。推翻現存政治是一致，建設未來理想不相同。後來雖勉強統一而成爲國

民黨，然已接受憲政黨的綱領，已非當日革命的精神，所以孫先生才組織中華革命黨來繼續革命的事業。就以五四運動之後而論，國內革命思想，蓬勃突興，激越的堅持共產革命的主張，和平的猶高唱好人政府的主義。前者目覩共產主義非中國的要求，不能不棄其主張復歸國民革命的道路，後者因軍閥依然不能接受，也只好深嘆『吾道不行』，重復希望國民黨的成功。而且當日如各省的革命小團體，也如雨後春筍，四處茁生，中間無政府主義和國家主義也曾爲一度之活躍，直至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思想才暫告統一，至於今日，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恰像萬派朝宗，但國民黨能夠成功的特質，不是單在於推翻現存的政治，而在於未來理想能適應民衆的需要。

.....

以上兩段話是說明革命的組織是爲民衆要求而產生，和革命黨的

政策未必與民衆相適應這兩句話。所以在革命當中有黨的立場，也同時有革命的立場。真正的革命黨應該使黨的立場切合革命的立場，真正的革命者也應該同時站在黨的立場和革命的立場。假使黨的政策不注意民衆的要求，是謂黨的不革命；假使黨的政策反對民衆的要求，是謂黨的反革命。我們爲什麼要罵腐傾分子，因爲他們只顧個人的利益，不注意民衆的要求。我們爲什麼要罵共產黨，因爲他們只擴大黨的勢力，反對民衆的要求。黨的革命與反革命，只看牠的政策與民衆的要求反對不反對。如果我們只片面的說，革命只有黨的立場，那麼我們再不必罵共產黨的暴動，殺人，放火，因爲他們是站在黨的立場；我們更不必罵共產黨反革命，因爲他們只向我們國民黨報復，并未有離開黨的立場。末了一句話，革命黨員對於黨的立場和革命的立場須有深刻的認識，但同時決不可使黨的立場和革命的立場有片刻的

分離。因我很相信，我們爲革命並且爲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但同時我更希望，忠於國民黨的同志們，時時要促進黨，擁護黨，不可使黨須臾失卻革命性。更不可空掛着革命黨的空招牌，去幹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事業。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初版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每冊定價三角□

著 者 陳 公 博

分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9107B

928866

998866